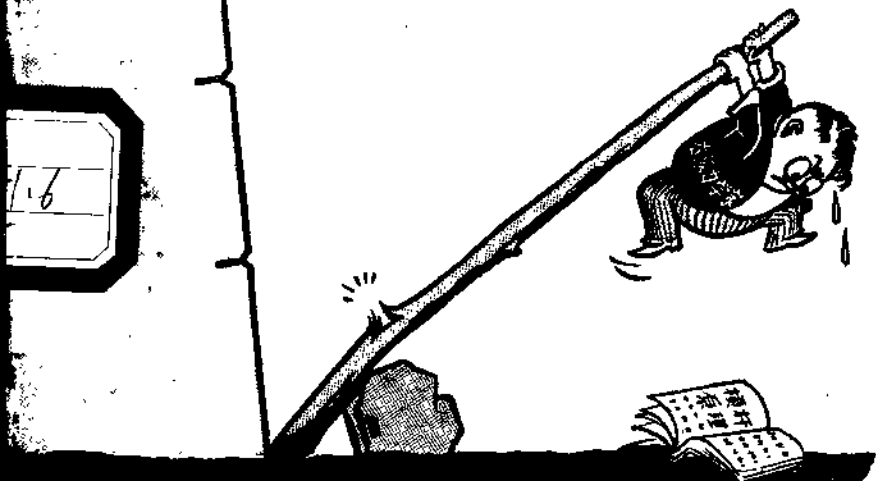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的嘴脸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



3008335 (星) 3008335

8502421

右派分子的嘴臉

355
5



D651.6/5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长沙



0662675

01
a

555
5
5

內 容 提 要

本书揭露了全国和本省几个重要的极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和反动言行，其中包括：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黃紹竑、龙云、葛佩琦、林希翎、杜迈之、康德、魏猛克、陈浴新、彭一湖和楊繼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右派分子的本来面目和他们反动言行的实质，更深入地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編号：(湘)0725
右 派 分 子 的 嘴 臉

編 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沙市橘子坡
印 刷 者：湖 南 印 刷 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 行 者：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

开本：787 X 1092 1/32
印张：2 3/4
字数：57,600
1957年10月第一版
195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300

统一书号：11106·13
定 价：(5)0.36元



前 言

1957年春天，祖国上空黑云乱翻，地下群魔乱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着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梦想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是，在全国人民及时英勇地向右派反击、展开了群众性的说理斗争下，他们的阴谋打算很快地失败了，这些右派分子已开始一个个现出了他们的原形；其中坚决顽抗到底或触犯刑律的，并将受到应得的依法制裁。

反击右派的斗争，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党的领导能否固如磐石的一场极其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很好地配合这一斗争，我们特就全国和本省报刊上已公布的材料，选择其中重要的极右派分子，加以综合、通俗地编写，成为这个小册子，以充分揭露这些右派家伙的丑恶面貌和反动言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做，使大家更好地认清这些极右派分子蛇蝎般的心肠，因而激发大家以更大的义愤和战斗力量，全力深入地投入这个伟大的斗争中去；把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拖拽出来，彻底孤立他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锄掉这些毒草以后能更顺利地进行。

編 者

1957年9月

CHPST/02

目 錄

- 反共三十年的章伯鈞…………… (1)
- 一条凶惡的毒蛇——罗隆基…………… (7)
- 政治賭徒章乃器…………… (14)
- 儲安平和“党天下”的謬論…………… (21)
- 屠杀共产党員的劊子手黃紹竑…………… (27)
- 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土皇帝——龙云…………… (33)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惡棍葛佩琦…………… (38)
- 害群之馬林希翎…………… (42)
- 湖南民盟右派集团头目杜迈之…………… (48)
- 康德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簡記…………… (54)
- 湖南文艺界的大右派分子魏猛克…………… (60)
- “头插野鷄毛”的右派“將軍”陈裕新…………… (67)
- 假裝替农民叫苦的老牌右派分子彭一湖…………… (73)
- 隐藏在中学教师队伍中的右派毒蛇——楊繼华…………… (79)

反共三十年的章伯鈞

从逃兵到叛徒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的屠殺下，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正象毛主席所說的，並沒有被吓倒、被屈服，他們掩埋好同伴們的屍體，揩干了身上的血跡，又去繼續戰鬥了。可是，在這個嚴重的時刻，也有一些原來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卻成了革命戰綫上可耻的逃兵、叛徒。現在著名的右派大頭目章伯鈞，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個反動成性的傢伙，背叛了共產黨以後，就參加了當時的第三黨。第三黨原是鄧演達創立的，意思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走中間的第三條道路。這條中間道路當然是走不通，第三黨領袖鄧演達不久就被蔣介石殺害了，他死以後，章伯鈞就爬上了第三黨領導人之一的地位。那時國民黨對共產黨進行着瘋狂的“圍剿”，全國是一片屍山血海，章伯鈞並不真正站在人民一邊，反對蔣介石，相反，卻提出了“七分反蔣、三分反共”的主張，他說：“第三黨應該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求發展。”他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相持不下，或者打得“兩敗俱傷”，他就好兩面訛詐，左右投機，坐收“漁翁之利”。

章伯鈞就是懷着這樣的惡毒心腸，在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

时候，打着“革命”的招牌，帮助人民的敌人的。他的丑恶的历史說来話長，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后，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大头目，真是一点不值得奇怪。

“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

抗日战争期間，章伯鈞到了重庆，打着第三党的招牌，积极活动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包括爭取蔣介石在內，一道抗日，因此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了章伯鈞以支持。可是，章伯鈞怎样呢？他当着共产党的面装得很诚恳，背后却說他去見中共代表是自己“下作”。但一到和“第三方面”人士打交道，他又馬上借着和共产党接近的招牌来卖弄自己。就章伯鈞來說，这些也許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买卖，他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罢了！

抗日战争快胜利的时候，第三党(又称“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改換名字。章伯鈞提出要用“农工民主党”的名称，当时他們党内很多领导人士不同意，觉得用这个名字不恰当，因为第三党根本代表不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可是章伯鈞一定要用，并且气势汹汹地說：“你們怕和共产党有抵触，我說，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原来，这个右派头子早就想和人民“爭天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伯鈞一方面繼續装得很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很接近；另一方面又和当时一些反动的小党派如青年党等勾勾搭搭。1946年11月間，他和另一个右派头子罗隆基一起，偷偷串通了青年党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写信給蔣介石，說如果和共产党和平談判不能达成協議，就希望蔣介石召开伪“国

民大会”。章伯鈞并表示要参加伪“国大”。

不久，他到了上海，但仍經常往南京跑，察看“行情”。他每次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帮蒋介石吹牛，說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力量怎么强，一定不会垮。談到共产党，就說这也不行，那也困难。他的看法是：“誰也消灭不了誰”，至多打成一个平手，以長江为界，造成一个“南北朝”，那时候，“第三方面”就兩边吃香，大有可为了。

1948年，章伯鈞到了香港，那时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被打得尿屎直流。他当时表面上反对蒋介石，但骨子里很不希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曾經派人到内地活动搞武装，妄图阻止全国人民真正解放。他指示这些人，凡是拉过来的国民党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他对人說：“毛澤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鈞就不能领导嗎？”

夢想“三分天下”

章伯鈞的“南北朝”的迷夢被粉碎了。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會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各民主党派都一致拥护，章伯鈞也装着拥护的样子。可是，当民盟总部研究新政协綱領时，他又坚决反对把“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和“承認共产党领导”兩条列进去，并且做起“三分天下”的夢来。

照章伯鈞的想法，中国可以分成三块：共产党在黄河流域，蒋介石在長江流域，“第三方面”在华南一帶。“第三方面”又靠什么人支持呢？他选中了桂系大战犯李宗仁，想拉攏李宗仁

等退守华南，共同建立“第三势力”。据他自己說，已經和“各友方”講好，編几十万軍隊，福建、江西就由农工民主党來搞。他說：有了軍隊就可以和共产党組織聯合政府了。其實是一句現話——就可以和人民、和共产党“爭天下”了。

不但这样，章伯鈞还秘密組織了所謂“民主行动委员会”，暗中拉了梁漱溟、張东蓀、罗隆基这一帮人，企图破坏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当他从香港上船到了东北解放区后，甚至还对人說，真后悔到东北來，想回香港去。这个无耻的政治野心家，就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还是要尽了花枪。

結成反动的章罗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团结爭取他为社会主义出力，給了他很大的信任。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在政府中当了交通部長。可是，这些还都不能使他滿足。他仍然卑鄙地采取兩面派的手法，口头上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拥护社会主义，而心里却在写“不”字。他不甘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說：“我这个部長就是守灵牌。”守的是什么灵牌呢？就是资产阶级的灵牌。他安的什么心眼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眼。

他和罗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过去因为在民盟内部里面爭权夺利，兩人关系时好时歹，常常发生不和。但因为他們都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心眼里一样骯髒，終于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联盟，成为近年来右派集团点火煽风最主要的指揮机关。

他們共同把持了民主同盟，排擠其他正直的不動搖的副主席，企圖使民盟完全變質成為一個資產階級右派的政黨。羅隆基手下有一批“大知識分子”，章伯鈞就想通過這個聯盟抓過來，共同來搞反黨反人民的勾當。

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章伯鈞更認為時機到了，到處宣傳民主黨派要發展一、二百萬黨員，並且要到各縣、要到基層發展民盟盟員和農工民主黨黨員。他強調民主黨派要“組織獨立、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想同共產黨“平起平坐”，唱對台戲。為了實現他狂妄的野心，他派出了一批親信到各地去招兵買馬，擴展組織，甚至指示這些人說，連經過勞改的農工民主黨的老黨員都可以吸收回來工作。

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反革命事件，章伯鈞更洋洋得意了。他逢人就宣傳：“中國的情況會大變，蘇聯也要變。”並且當着交通部部長助理孫大光同志的面謾罵：馬列主義是“上帝”，共產黨員是“清教徒”，農民是“農奴”。並說，這樣下去非造反不行。

妄圖使人民的中國變天

章伯鈞的這種活動，活畫出他一貫在政治上的黑心腸，就是：妄圖使資本主義復辟，妄圖使人民中國變天。果然，當1957年5月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發表後，章伯鈞就趁此時機，打起幫黨整風的幌子，親自出馬並指揮章羅聯盟的大小嘍囉，瘋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了。

他首先指使預先布置在光明日報當總編輯的得力爪牙右派

分子儲安平制造輿論，派記者到全國九個大城市點火，同當時被羅隆基所控制的文匯報相呼應。接着又親自提出了什麼“政治設計院”、“兩院制”等主張，企圖用民主黨派的“輪流執政”代替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來代替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民盟內部，他們私自成立了“科學規劃小組”、“學校黨委制小組”等四個小組，並且動員了一些右派教授來擬訂所謂“科學規劃草案”，企圖從新聞界、文藝界、科學技術界和高等學校首先把黨組織“趕出去”，反掉社會主義方向。這時，北京、上海和全國一些高等學校都出現了右派集團或右派分子，在有些地方農村里地主、富農、殘余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動了起來，真是上下串連、八方呼應，剎時烏雲籠罩了中國的天空。

就在這時候，反動的章羅聯盟的主帥章伯鈞找了北京的六個教授舉行緊急會議。他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是：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农起來鬧事，學生們的大字報也會把學校里的黨委罵得“下台”，再加請愿示威，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他們說：“共產黨能‘放’不能‘收’，要‘收’得靠三百万軍隊，但是人心去了，這條船要沉了。”怎麼辦呢？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收拾殘局’。”原來這幫唯恐天下不亂的反動分子，還在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呢！他們愈是發瘋，愈是忘記了他們自己只是那麼小小的一撮，而全國千千萬萬的工人、農民和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是熱愛黨、擁護黨的。

碰得头破血流

果然，就在他們开会的第二天——1957年6月8日，工人講話了，农民講話了，知識分子講話了，一切热爱党、拥护党的人們講話了；接着从全国各地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說的“人民的国家巩固得很！”在广大群众的圍攻和追击下，章罗联盟的反动迷夢被彻底粉碎了，章罗联盟的内幕被兜底翻出来，无处隱形，章伯鈞也不得不开始向人民低头認罪。斗争正在繼續深入，章伯鈞如还不彻底繳械投降，人民群众是决不能輕易饒恕他的。

一条凶惡的毒蛇——罗隆基

反共起家

二十七年前上海，到处是舞場、錢庄、妓院和交易所。在上海馬路上和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的是大肚皮的商人、流氓、惡少和外国冒險家。

在这个冒險家的“乐园”里，也有一些“教授”和“学者”，他們到外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回国以后，挂起金字招牌，搖笔杆，写文章，販运资产阶级的貨色，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这里面有一个小集团，后来被人家叫做“新月派”，因为他們办了一种

“新月”杂志。

右派头子罗隆基就是从这里开始露出头角。那时他才三十三岁，先在美国学过两年“政治”，后来又跑到英国拜在反动学者拉斯基的門下，花了四年工夫，騙到了一个“博士”头衔。回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新月派”集团，和胡适、梁实秋这帮极端反动的家伙勾搭在一起；不久又当上了“新月”杂志的主編。他在这个杂志上写了許多又臭又長的文章，宣傳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在一篇“論共产主义”的文章里，罗隆基首先对馬克思和苏联誣蔑了一通，接着声明說：“我不是先有打倒共产主义的成見，才来写这篇文章”，而是根据“許多欧西学者的說法”。

罗隆基是以反共起家的。从写这些文章算起，已有將近三十年的反共历史，可是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却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向日本强盜献媚

日本强盜曾經是中国人民最凶惡的敌人。可是，罗隆基为了反共，却討好日本帝国主义，向它使媚眼，送秋波。1935年，他应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聘請，到天津“益世报”担任主笔。到益世报后，他提出了“在南方談抗日，在北方談反蔣”的主張。罗隆基那时是在北方，自然是丢开抗日、大談反蔣了。可是反对抗日必然也“反共”，当时日本强盜正想把华北一口吞并下去，罗隆基的这个主張，其实是反对抗日民族統一战线，压制进步的学生运动，制造“华北特殊化”，这就进一步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他并且公开給日本軍閥献策，要“注意亞洲的共产主义势力”。日本人听了

自然很高兴，就出錢讓他在天津办一个什么“研究所”；罗隆基既然拿了日本鬼子的錢，当了地地道道的汉奸，自然只有出卖民族利益帮它講話了。

这个时候，罗隆基还和張君勱、張东蓀这些反动分子混在一起，組織了“国家社会党”。罗隆基說：“政治家之于政党，譬如旅行者找寻旅館，在大飯店已經客滿的时候，小客棧也不妨住住。”其实，罗隆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这一段話，就活画出他的丑惡的投机分子的嘴臉。

美国人的“可用之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罗隆基从北方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書。于是，他又“搖身一变”，以“民主教授”自命，裝成一付进步面孔，并且参加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民盟的中央委員。这样一来，罗隆基更有干政治投机的本錢了。

民主同盟中有左右兩派。罗隆基一开始就是右派，他和民盟内部的进步人士鬧对立，另外联络了一批人，經常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宗派。这批人中間，有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潘大逵等，都是目前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是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

在昆明搞了一个时期后，罗隆基到了重庆。他原来就是在美国留学的，巴結美国人自然比他在天津靠攏日本人更順当，关系也更深了一层。他和馬歇爾、司徒雷登、魏德迈这些美帝国主义派来的“欽差”来往很密切，美国人也認为他是“可用之材”。美国人原是蔣介石的“干爸爸”，得到美国的賞識，罗隆基更得意忘形了。果然，当抗日战争胜利后，蔣介石和司徒雷登簽訂美

國的美蔣商約的時候，羅隆基就到處為這個條約辯護，說它是一個真正平等的條約；並且諷刺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說中共負責人根本沒有看過這個條約。羅隆基就是這樣向美帝國主義賣身投靠的。

和反動派的勾搭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國人出槍出錢的支持下，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在1946年，曾經和蔣介石進行了一整年的談判。在這個談判中，民盟也以“第三方面”的身份參加了。

當時國民黨對民盟是一打一拉，打的是民盟的左派，拉的是張君勱、羅隆基等右派。那時“第三方面”天天在南京交通銀行開會，國民黨反動派雷震也幾乎天天到交通銀行來找羅隆基秘密談話。在密談中，羅隆基把開會的情形向雷震“匯報”，雷震也通過和羅隆基的談話來影響會議。

這年11月11日，蔣介石決定撕毀舊政協決議，單獨召開偽“國民大會”，並揚言第二天就要開幕。照理說，第三方面的人士都應該拒絕參加。可是那天下午，羅隆基竟和青年黨的一批反動分子串通一起，並騙取第三方面人士簽名，向蔣介石提出建議，主張把偽“國大”延遲到12月1日召開，在18天中繼續舉行和談，如果仍無結果，則參加簽名的人全體參加偽“國大”。這個“建議”剛寫完，正好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等三位同志到交通銀行來和大家交換意見。但羅隆基卻把這個“建議”對中共代表瞞着不談，等周恩來等同志一走，就立刻把它交給了莫德惠，準備當晚送給蔣介石。幸亏這種無恥詭計被沈鈞儒等很

快識破，連忙把這件事告訴了中共代表團，并向莫德惠追回了那封“建議”信，才把這個陰謀粉碎了。

1946年11月15日，蔣介石的偽“國大”召開，民盟的進步人士如沈鈞儒等都堅持不參加，羅隆基拗不過，也只好不參加。但當中共代表和民盟人士從南京陸續回到上海後，羅隆基一個人卻仍留在南京，與雷震勾搭在一起，表示對烏煙瘴氣的南京偽“國大”戀戀不捨。到第二年，國民黨對民盟的迫害更加厲害了，1947年年底，終於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這時民盟中的進步人士都從上海到了香港，有些人如杜斌丞等則在國內遭到殺害。而羅隆基卻在這時從南京到了上海，不但自己不去香港，並且威脅和恐嚇當時民盟的主席張瀾也不去香港。甚至到1948年底，當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組織竭力營救張瀾出險的時候，羅隆基還對張瀾進行了恐嚇。

羅隆基到上海後，又來了一個“遵從政令”，宣布“民盟自動解散”；接着就拿了美國人和反動政府的錢，住進上海一家最闊氣的虹橋療養院去休養了。在“休養”的時候，不但雷震常常跑到上海去看他，馬歇爾還常常從美國寄藥給他。他還和特務頭子楊虎拜了把兄弟，並且跟大漢奸周佛海的老婆勾勾搭搭。他又寫文章捧桂系的大戰犯李宗仁，支持李宗仁竟選偽副總統。1948年濟南解放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羅隆基特地向司徒雷登獻計，他說：“美國買馬買錯了，如果把給蔣介石的錢的十分之一拿給民盟，那會要好得多。”意思是說，美國如果把錢交給他這個無耻政客，他比蔣介石國民黨有更高明的賣國本領。

可是，這條右派毒蛇對共產黨，對民盟的進步人士又是怎樣呢？1948年，當民盟在香港召開三中全會，批判他和章伯鈞的申

間政治路線時，他就在上海表示反對。後來民盟中央委員吳晗經過上海到解放區去，羅隆基又托吳晗帶信給現在民盟的主席沈鈞儒，提出要辦“協和外交”，反對向蘇聯一邊倒，並且威脅說：“否則，民盟就要退居在野黨，不參加聯合政府。”

羅隆基為了和國民黨勾搭，一直住在蔣管區，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他才去到北京。在到北京前，司徒雷登還和他見了面，托他轉告周總理，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不是一邊倒，美國就可以給幾十億美元的“援助”，企圖拿這些臭錢來收買中國人民。羅隆基看到新華社的社論，知道美國人的痴心夢想不能實現，才吓得不敢開口了。

這就是羅隆基在解放戰爭時期搞的一些鬼花樣。

向共產黨發動猖狂的進攻

羅隆基到北京後，人民寬恕了他過去的罪惡，讓他擔任了全國政協的委員、政務院的政務委員，接着又選他當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由政府任命他為森林工業部的部長。民盟還選他當了副主席。可是，這個野心的政客和章伯鈞一樣是利欲薰心，對這些優厚待遇毫不滿足。他一心要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他向周總理公開表示：“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意思是要和共產黨平起平坐，輪流執政。實際上就是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的道路。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後，羅隆基張東蓀反共集團還幻想美蔣“反攻”大陸，他們就好混水摸魚，“有所作為”。以後在“三反”運動中張東蓀的叛國陰謀敗露，被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職務。就在這個時候，羅隆基還要挾民盟張瀾主席出來

帮張东蓀講話，想极力为張东蓀和他們的小集团掩护，遭到了張瀾主席的痛斥，罗隆基的阴谋才沒有得到实现。

但是，罗隆基不但繼續保持了自己的反动的小集团，并且还在太原、四川、浙江、上海、湖南、湖北到处布置了爪牙。接着，他又和章伯鈞正式結成了反动的章罗联盟，在民盟内部形成了右派集团，大力抓取知識分子，企图作为他們反共反人民的本錢。同时他还把他的亲信女將浦熙修安插到文汇报去，通过浦熙修和徐鑄成篡改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发表許多歪曲的荒謬的报导和文章，煽动知識分子对党的不滿。到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他就借着大“放”大“鳴”的机会，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公开提出要另外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来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并且提出共产党不要在知識分子中发展党员，要由章罗联盟所控制的民盟右派集团来发展。在民盟内部，他們私自成立了“科学规划小组”“学校党委制小组”等四个小组，并且动員了他的反动集团的骨干費孝通、吳景超等来拟訂所謂“科学规划草案”，企图从新聞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和高等学校首先把党组织“赶出去”，反掉社会主义的方向。儲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提出了“党天下”的謬論，事先也和罗隆基商量过，得到了罗隆基的指示。这时，中国上空黑云乱翻，章罗联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喽囉都出动了，到处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們夢想一旦在中国发生了1956年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就好由他們这帮人来“收拾殘局”了。

毒蛇現了原形

可是，羅隆基的如意算盤沒能打下去，自己却現了凶惡的原形。在全國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民盟內部進步人士的揭露、打擊下，這個狡猾的野心家終於被拖了出來，不得不在全國人民的面前開始低頭認罪，吞吞吐吐地承認了自己的一些罪行。現在，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要把反擊右派的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撲滅章羅聯盟和其他一切右派分子的毒籛，堅決保衛社會主義的成果，在共產黨領導下建成社會主義。

政治賭徒章乃器

右派分子“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夢想使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中國復辟，並充當這一陰謀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於是他趁鳴放的機會，假借幫助黨整風的幌子，大肆歪曲黨和政府對私營工商業採取和平改造的方針、政策，放出了一系列的資本主義毒素，妄圖挑撥引誘工商業者抗拒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本上取消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

“定息不是剝削”

當前資本家拿的定息，是國家從工人用勞動所創造的生產價值之中，抽出盈利的一部分來，按照資本家轉入合營企業中生



355
5

产... 定1 0662675 資本家的。

这一部分价值，便由全民财富的性质，转变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收入。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是，章乃器却装着看不见，他为着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实质，妄称资本家所取得的定息，只是什么“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不是剥削收入。为什么？据说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当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所以受剥削就“不那样很痛苦”了。其实，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是对抗性的，只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来处理，谁说“并不具有对抗性”呢？何况即使没有对抗性矛盾，也并不等于没有矛盾；被剥削者对于“定息”的感受固然不算“很痛苦”，但也并不等于就不痛苦，那末，怎能把既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说成不是“剥削”呢？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谬论，只有象章乃器这样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才说得出口！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

资本家一方面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拿定息，他们还在剥削工人阶级。这就是他们的两面性。但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必须“辩证地看”，而“辩证地看”的结果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难道它还会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难道它还会重施五毒？”因而得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结论。更从这个结论得出另一个结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虽有本质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却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资产阶级只能消

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却是可以改造的。”人们要问，为什么“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没有“只能消灭”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呢？难道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居然“特殊”到这种程度，连本阶级的本质都没有了？问题很清楚，章乃器的“辩证”论所要告诉人们的是：既然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那末要说资产阶级(分子)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分子)也有两面性。这就是要神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制造工商界的思想混乱。更阴险的是，既然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大家正在向着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那末，你是人，我也是人，国家可以是你——工人阶级(分子)领导，也可以是我——资产阶级(分子)领导。这岂不是和另一个右派分子叫嚣要“轮流执政”的论调一样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红色资产阶级”

谁都知道，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经过“脱胎换骨”式的本质的改造。事实上，当前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继续进行改造。但章乃器硬说，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得够了，不需要再“改造”什么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业者增加无穷的忧虑”。为了挑起工商界的反抗情绪，他接着一再发问：“难道还会重施‘五毒’？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用心的毒恶，于此可见。他甚至以地主来相比，说什么“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了，……”资本家当然改造得更好。试问资本家的剥削本性比“反动的地主”究竟好在哪里？由此，他居然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口号，要组

織什么“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想借此與工人階級政黨分庭抗禮，混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區別，反對黨的領導，抗拒黨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工作。

“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

事實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無比優越的，我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是我們的死敵。但資本主義的代言人的章乃器，對社會主義深惡痛絕，對資本主義則備加頌揚，硬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死心塌地把歷史車輪推向后轉，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誰也知道，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什麼官僚主義社會，官僚主義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一種習氣、作風而不是一種“制度”，它不能離開舊的社會制度而獨立存在。章乃器這句鬼話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所以，他接着一再誇大資本主義的優越，資本家如何“善於用人”，有“事業心”；把社會主義制度說得灰溜溜的，對它的優越性要打“很大的折扣”。他誹謗社會主義企業，認為社會主義加上官僚主義，企業的效率還比不上資本主義。他把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個別缺點，誇大到比吃人的階級對抗社會還不如。他如此丑化社會主義，贊美資本主義，硬把工作中的缺點——官僚主義，同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相提並論，其用意何在，難道還不是非常明白嗎？

反動小集團的罪惡活動

章乃器組織反動小集團，作為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的工具。妄想操縱民建中央機關，以便把它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基地。

这个小集团有丁国楨、許汉三、林滌非、丁裕長、戴家瀛等，无一不是一贯反共，历史复杂，品質极端恶劣的人。其中有的是特务，已經被捕，有的是向公安部門登記过的分子。章乃器利用这批家伙，在民建会內进行了許多罪恶活动：（1）在会內制造分裂，阴谋夺取会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章乃器唆使林滌非、丁裕長写匿名信給李維汉部長，說民建会內有宗派活动，并說民建会內的党员支持了这一活动。（2）打击会內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使民建脱离党的领导。同时，章乃器不惜泄露国家的机密，使他的反动集团分子能在机关干部中卖弄消息灵通，以抬高身价。并吹嘘他們是“找不到的几根笔杆子”，企图在干部中間造成“声誉”，便于他們打击领导。（3）他們在宣傳教育工作上，对工商界施放章乃器的反动言論的毒气，鼓动工商业者“抬起头来”抗拒改造，从中央到地方，組織力量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

和軍閥、特务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

章乃器原来是由浙江財閥和軍閥所豢养出来的一个政治野心家。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地与軍閥、特务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大家知道，他是以在抗日战争前参加“救亡运动”成为“七君子”之一而起家的。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暗地里不断地进行过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一方面参加救国会，一方面又和国民党反动头子潘公展相勾搭，与軍閥李宗仁密电往来，为宋子文办“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在蔣介石镇压救亡运动时，他被“錯捕”了。在獄中就轉托陈誠的亲信赵志堯向陈誠求救，吹嘘自己是“理财專家”，可以替蔣介石

“貢獻微末”。果然，出獄後他就叛賣了救國會，發表“少號召，多建議”的文章，公開擁蔣，反對共產黨對救亡運動的領導。

抗戰開始，他到了武漢，為陳誠獻策，搞三青團。又找李宗仁，結果當上了安徽省府秘書長兼財政廳長。為國民黨反動派搜刮民財，積極支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為皖南事變作好準備工作。而最惡毒的是，他收集了民間槍枝，組織武裝稽征隊伍，一方面限制了新四軍的發展，同時這支隊伍以後又變成了“反共”的先鋒。

由安徽到重慶，他又搭上了特務頭子戴笠的關係，與流氓頭子杜月笙之流同流合污，搞起投機倒把的上川公司來了。同時，公開擁護蔣介石提出的“一個政府，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反動口號。他在一篇“團結之道，建國之道”的文章里寫道：“沒有統一，就沒有抗戰，那國且不國，還談什麼民主。”又說：“抗戰以後，我們已經在一個政府，一個黨，一個領袖之下統一起來，這是歷史上一個極偉大的功業，……”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他除了站進民建會，想借工商界的群眾基礎來搞點政治資本，以達到他的政治野心的要求之外，仍然和軍統特務廖公超保持着關係，並和特務梁延武共同支持孫采華搞偽國大代表。另外還和特務楊之清、叛徒彭壽時有來往。

“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濟算盤”

解放以後，他來到北京，仍然包庇、引入和重用特務、反革命分子，處心積慮地布置據點，進行陰謀活動。同時大量搜集古董，人家問他為什麼買這麼多古董，他倒說了一句真心話：“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濟算盤。”他妄想萬一人民政府垮了台，他的古

董还是值錢的。这就充分說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的投机性。后来民建会在北京复会，他是負責人之一，又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員，他就在会內反对“团结、扶助、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針，主張民建会应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必帮助工商界进行改造。党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后，他一再強調民主党派組織独立，政治自由，更加露骨地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自从他的反动言行遭到各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他的反动活动縮小到“思想問題”或“理解問題”上去，象鸵鳥一样把头藏到沙粒中去，躲避人們的追击，但是，在鉄証如山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道理面前，右派分子的隱形术，是騙不过人民的眼睛的。

章乃器的“賭历表”

从上述簡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个三十年来的政治賭徒的“賭历表”。他和一般賭徒不同，不是押單双，而是押左右的，不过当他押左的时候，同时是搭着右的，象一根黑綫一样，他基本上始終是右的。抗日战争前，他軋准了苗头，押了一宝左，贏得了“君子”的头銜；抗战时看风色，又押了一宝右，撈得了个“財政厅长”；解放战争末期观天象，又押了一宝左，在民主党派里弄得了重要职位；这一回又瞧上了大鳴大放的“缺口”，孤注一擲押了一宝右，不料老將失风，这次連本帶利輸得精光了。

儲安平和“党天下”的謬論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光明日报总編輯的右派分子儲安平，发表了一篇题为“党天下”的謬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惡毒的誣蔑和攻击。他把毛主席比作“老和尚”，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比作“小和尚”，来丑化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全体共产党员。他的謬論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憤怒，同时也获得我們的敌人——台湾蒋介石美国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大声叫好。

原来是一个老牌右派分子

儲安平是一个什么人呢？原来他是一个老牌右派分子。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期間，他主編观察杂志，就以所謂“中間路綫”相标榜。他反对共产党，但对国民党反动派則“小罵大帮忙”。

1947年，他在观察杂志二卷二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政局”的專論，其中有一段說：“坦而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之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統治精神上說，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兩者都企图透过严密的組織，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爭中，共产

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張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在这篇專論中，他还說：“共产党对人只有‘敌’‘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敌視。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誼。……老实說：我們現在爭自由，在国民党統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問題，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問題了。”

由于他这样坚决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所以他在这篇專論中，把他对当时中国政局的理想寄托在所謂“自由思想分子”身上。他說：“在这种兩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領導，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

1947年，毛澤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中指出：“蔣介石統治区域的上层小資产階級及中等資产階級，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蔣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們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儲安平就是当时这一小撮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資产階級右翼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統治完全复灭了，国民党固然垮台，所謂“自由分子”也沒有如儲安平所期望，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儲安平的迷夢才破灭了。

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

解放后，人民寬恕了他以往的罪行，可是他仍然执迷不悟，参与了反动的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章罗联盟为了篡夺宣傳阵地，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派他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編輯。

他在反动的章罗联盟指使下，积极地宣傳着右派分子章伯鈞、罗隆基的办报主張，認為今天的报纸应该回头来向解放前国民党地区的旧报纸学习。他否認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公开地说：“我們的任务是揭露；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主張国际报导方面要用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

因此，在他任总編輯的一个短时期中，他就使得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如关于北大民主牆的錯誤报导和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聞等，攻击党的領導，損害党的威信。

派人到九大城市到处点火

他同时还派了好些記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蘭州、沈阳、長春、青島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談会，到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驟，煽动人民对党不滿，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說成一团漆黑，妄想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他到处点火的結果，不仅使光明日报一度迷失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使他自己越来越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因而在统战部的座談会上，发出了那篇臭不可聞的“党天下”的謬論。

“党天下”的葫蘆里賣着毒藥

儲安平在“党天下”的發言中，打着反宗派主義的幌子，对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使得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也向他“遙致敬意”。他誣蔑共产党有“党天下”的思想，現在的中國是“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悍然不顧事實地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他在这里惡毒地挑撥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众之間的關係，把共产党员都描繪成爲專制的魔王，全國大小單位都被這些專制魔王把持着，毫無民主氣息。

他還說：“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想以此來挑撥民主黨派和共产党的關係，鼓勵它們擺脫共产党的領導，來個“共同領導”，“分庭抗禮”。

他認爲“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推翻人民民主專政，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他還反對共产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企圖代之以資產階級的、由各黨各派輪流執政的“聯合政權”，把歷史的車輪拉回頭去。他意味深長地說：1949年開國以後，“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言下之意，自然，後來就不象個聯合政府的样子了。這不僅是歪曲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意義與性質，抹煞了民主黨派參與國家政權的事實，並且是对党及其領導者的政治威信的惡意誣蔑！

总之，不論他的措詞如何隱晦曲折，我們如果擦亮眼睛，仔細分析，便不難看出他的發言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實質。

誣蔑黨有“莫非王土”的思想

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含義是什麼呢？

它的第一個含義是：黨是在“占有”着國家，而不是在“領導”着國家。儲安平在發言中巧妙地暗示着：目前不是黨領導國家，而是國家為黨所有；國家的主人不是人民，而是所有的黨員把持着國家。由於黨有“莫非王土”的思想，於是產生了“共產黨一家天下”的局面。在他的心目中，共產黨就象封建王朝一樣，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封建宗派。

這是多么惡毒的誣蔑！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占有着國家，而是領導着國家和人民。它“以天下為己任”，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它的這種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是人民所信任、所給與的。它之所以能領導國家和人民，是由於黨除了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任何獨立於人民利益之外的黨的利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解放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全國人民起來開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擊退了美國帝國主義的進攻，消滅了國內反動階級的殘餘力量，保衛了人民民主革命鬥爭的成果，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接着又有“三反”“五反”運動，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條件，奠定基

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为着纯洁党的内部和人民内部，又展开了“肃反”运动。经过这五大运动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預定在三个五年計劃之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把我們祖国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現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已經胜利完成，正向第二个五年計劃迈进，国家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水平，均有很大的进步与提高。所有这些，都有力地駁斥了儲安平的胡說。很明显，今天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中国，党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任何对党和人民关系的挑撥，是絕對不能得逞的。

誣蔑党員把持着一切機構

“党天下”的第二个含义，是“共产党的清一色”。他誣蔑党“在全国范围内，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党員做头儿，事无巨細，都要看党員的顏色行事”。

事实是如何的呢？今天，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各級政府機構中，都有着很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党外人士担任着各种負責职务；在各种機構中，都实行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体領導的原則。举一个最切近的例子，右派分子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掄，不都是部長、副部長嗎？儲安平本人不也是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編輯嗎？当然，有大量的共产党員在担任着領導工作，这是事实；但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共产党領導国家和人民，决不能是抽象的、架空的，它必須通过具体的人來領導，因而这一事实正是反映了党在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中的核

心领导作用。

有的时候，共产党员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或许有不称职的现象，但这只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党中央已经一再号召这些党员深入工作，钻研业务，交外行为内行；而非党员中也同样有个别不称职的人。储安平象煞有介事地质问党为什么把很多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显然是夸大事实，别有用心！

必须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

储安平及其他右派分子，敢于散布謠言，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挑战，正说明右派分子的放火行为，已经首先烧昏了他们自己的头脑，完全抹煞了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妄图借尸还魂，死灰复燃，是免不了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为着保护社会主义事业，保护党的领导权，全国人民已经团结起来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批判他们的谬论，对他们展开无情的打击和斗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屠杀共产党员的劊子手黄绍竑

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揭露了一个老牌右派分子，叫做黄绍竑。他趁着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刮起一股妖风，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黄绍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卑鄙的政客和屠杀共产党员的

劊子手。

一个卑鄙的政客

黃紹竑原是桂系軍閥李宗仁的得力幫手。在很早的時候，他和李宗仁同是廣東軍閥陳炯明的部下，他們跟着陳炯明一道反對孫中山。1923年，孫中山先生出師桂林北伐的時候，他們曾率領軍隊在廣西省境內的西江上游，襲擊過孫中山先生大本營的船隻，企圖阻攔孫中山先生北伐軍的前進。不久，國民革命軍打敗了陳炯明，黃紹竑見大勢不妙，連忙倒戈投降廣州國民政府，並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副軍長，兼國民黨的黨代表。他就是這樣以進行政治投機起家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黃紹竑做了廣西省政府主席、十五軍軍長。這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他是最早積極支持反共的一個。蔣介石在南京召開“清黨”會議，他連忙跑去參加，回到廣西後，擔任了廣西的“清黨”主任，並且特別賣力。“八一”南昌起義，黃紹竑又先後派出和率領了他的三個師去攻打賀龍和葉挺將軍的部隊，成了反共的急先鋒。

黃紹竑原是桂系軍閥的走狗，但當1929年蔣桂軍閥內戰的時候，他看到桂系失敗了，又連忙丟掉舊主子，換了新主子，在蔣介石的偽國民政府內擔任內政部長。從此，他成了蔣介石的心腹，蔣介石對他特別賞識。接着，就被調到蔣介石的家鄉浙江擔任偽省主席了。

黃紹竑還是破壞十九路軍反蔣運動的罪魁。1933年，他正在浙江做偽省主席，那時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策劃反蔣鬥爭，他奉了蔣介石的命令，偽裝成反蔣的樣子，跑到香港，竊取了十

九路軍的全部反蔣計劃。回來以後，馬上把這個計劃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蔣介石，使得以十九路軍為中心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蔣運動遭到了失敗。

屠殺共產黨員的劊子手

黃紹竑不但是一个无耻的政客，而且是一个屠杀共产党员的劊子手。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前，黃紹竑就曾亲下密令大捕广西革命人士，光在南宁一个地方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在千人以上。“四·一二”事变那天早上，黃紹竑在南宁又捉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加以杀害。这年9月1日，黃紹竑在南宁枪杀了当时在广西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人物雷沛濤、周仲武、雷天壯等十三位革命志士。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公开或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者。

抗日战争以前，他在浙江做伪省主席，更疯狂地屠杀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单在平阳一县被残杀和迫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对屠杀革命志士不但不认为是“黑良心”，还对他手下在这方面一些得力的爪牙封官加赏。例如，那时有个伪县长張韶舞，专会搜杀共产党人，并举行过“人头展览”，黃紹竑认为他杀人“有功”，便曾嘉奖他为“模范县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在永康县谋杀了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書記張貴卿同志。1940年年底，顧祝同和上官云相策划发动皖南事变，消灭我新四軍軍部，黃紹竑也曾参与了密謀。在这场反共凶杀中，我叶挺軍長被俘，項英政委陣亡，还牺牲了数不清的优秀革命同志。解放前，黃紹竑就是

这样一个双手沾滿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鮮血的大劊子手！

替反革命分子鳴“冤”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由于他在香港参加起义，饒恕了他的历史罪惡，并且給了他为人民效力的机会，黃紹茲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大常委会的委員，同时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員。可是他却繼續坚持反动立場，对党和人民政府怀着深刻的仇恨，并到处替反革命分子鳴“冤”，替不法地主翻案。

1956年，他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視察司法工作。他是全国人民代表，照理講，应当帮助这些地方的司法部門改进和提高工作，可是他却不是这样，而是別有用心地多方面寻找党和人民政府的岔子。例如，在視察檢察院和法院的时候，他从沒有問起反革命的活动怎么样，反革命分子肃清得彻底不彻底，相反地，却專門問“法院錯判了多少案子？”“檢察院有无違反逮捕拘留条件羈押入犯的事情，有沒有不該起訴的起訴了？”在律師和陪審員座談会上，他更露骨地片面地挑剔法院和檢察院的毛病。

在視察的时候，他还經常去“探監”。他到了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坐下只問了兩句：“犯人吃得飽不飽？”“有沒有打罵犯人的事情？”接着就亲自去“訪問”犯人。当他問遍了三个監房沒有发现問題时，他又亲自提审犯人，他对在押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玄时說：“我也是国民党人，你有什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什么不好的，都可以对我講。”他还和陰謀在广州发动“双十”暴乱的敌人派遣特务談过話，表示对这些人的关心。

在上海的时候，他还指名调阅了一些反革命犯的案卷，这些人都是他的旧部下，老同事。他煞费苦心地想从这里找寻向司法和公安部門进攻的炮弹。在一次司法座谈会上，他竟然說：“即使罪該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生活負担的話，政府还要救济其家屬，是否合算，是否合乎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反对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充分表现了对反革命分子的“爱护”和“关心”。

黃紹竑歪曲顛倒事实，竭力攻击我們国家法制不完备，裝出一副“包青天”的样子，替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鳴“冤”、叫“屈”、翻案。在他的煽动下，有些反革命分子气焰囂張，竟不服管束，甚至要求改判，并要求发还被沒收的财产；有的写了信向黃紹竑称謝，对他“无限欽佩”；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宣称：“将来有了选举权，一定要投黃紹竑一票。”

向党展开猖狂进攻

黃紹竑做反革命分子的“包龙图”还不够，1957年，他趁着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又到处点火，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公开宣傳：“党不能发号施令”。他說：党向人民或者和政府联合向人民发布指示，这会妨碍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并且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其实，黃紹竑完全是睁着眼睛說瞎話。我們知道，党在全国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党所发出的各种号召和指示，都是根据每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經過仔細研究提出的，全国人民在有了困难或方向不明的时候，都伸長頸子盼望着党給予新的指示，才知道应该怎样行动去克服困难，取得革命工作的新胜利。三十多年来，党领导我們

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現在和將來，我們也决不能离开党的領導去建設社会主义。“沒有共产党，就沒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人人都懂得的真理。可是黃紹竑却反对党向人民群众发出号召和指示，并且誣蔑說这会造出什么官僚主义等等，这不是企图取消党的領導是什么？这不是向党进攻是什么？

黃紹竑还企图全面否定党和政府的成績。他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个别的’已經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这样会意味着強調成績，掩盖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这也是一种顛倒是非的胡說。任何人都知道，在我們国家工作中，本来成績就是主要的，偉大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微小的。而且就是这些个别的、微小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党也从来沒有想掩盖它，相反地，却是鼓励人民尽量提出各种批評和改进意見，这次党发动全国人民帮助党进行整风，难道不是最好的証明嗎？黃紹竑閉着眼睛不看这些，一味造謠污蔑，其目的就是想全面否定我們党和政府工作的成績，把新社会說成一团漆黑，使我們对走社会主义路道减低信心，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嗎？黃紹竑这种用心是很惡毒的，例如，他夸大了我們司法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把它說得十分黑暗凄慘，說什么“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国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便是想全面抹煞人民司法工作的成績。

不但这样，黃紹竑还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个女右派分子譚惕吾勾結在一起，指使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在北京高等学校里到处点火，向党进攻，企图进一步达到他反对共产党 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

阴谋破产了

尽管黄紹兹这个凶惡的右派分子，玩尽了花样，采取了各种办法向党进攻，并且在进攻时裝着一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样子，但是謊言混不了事实，他的阴谋很快就被全国有觉悟的工人、农民識破了。例如，他在永康县方岩乡謀杀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刘英同志等的事情，就是当地一个农民在看到黄紹兹的反动言行后揭露的。現在，在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的怒火下，黄紹兹已經現出了他的原形，原来他是一个一貫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

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土皇帝——龙云

仇視苏联，污蔑党的外交政策

每个中国人民都热爱苏联。他們知道：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候，只有苏联真正同情我們；在中国人民推翻蔣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統治的时候，只有苏联在精神上道义上支持我們；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認我們；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又是苏联給了我們最偉大的援助。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毛主席教导我們，必須向苏联一边倒。

可是，有些右派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心眼不一样，他們坚持反动立場，仇視社会主义的苏联，仇視党的外交政策。他們在这方面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老牌右派分子

龙云。

提起龙云来，誰都知道他曾經是云南的“土皇帝”，抗日战争胜利前，在他统治云南的十八年中，对云南人民作的孽、犯的罪，真是連金沙江的水都洗不清。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寬恕了他的历史罪惡，讓他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希望他洗心革面，重新为人民效力。可是这个老牌右派分子却本性不改，在今年5月趁党整风的机会，象猫头鷹一样唱起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濫調，对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惡意的攻击。

他首先反对抗美援朝，說“抗美援朝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这完全是一种顛倒黑白的胡說。我們知道，抗美援朝虽然从性質上說，是社会主义陣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但首先是我們自己保家卫国。如果我們不在四年以前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偉大胜利，那末美帝国主义早从鴨綠江边打过来了，我們还談得到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設？再說，朝鮮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朝鮮人民和中国人民努力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苏联大力幫助我們装备海陆空軍，当时替我們守住旅順、大連，加上中苏友好同盟条約的威力，我們又怎能取得这个胜利呢？并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間，除了我們以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了很大的力，給了朝鮮人民很大的援助。所以，龙云这种說法本身就是一种污蔑，目的是想挑撥我們和苏联的关系。

其次，龙云又混淆苏联对我国借款的性質，說“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內还清，時間过短还要付息”，不象美国借款給別的国家可以“賴債”，有的可以“不要还了”。这更是豈有此理。我們知道，苏联对我国曾有过兩次借款，不但利息是最低的，而且

按照協定，蘇聯把大量機器、設備供應我國，我國可以用土產去抵還。那時，美國正脅迫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在經濟上實行封鎖，如果沒有蘇聯這樣慷慨無私的援助，莫說我們將得不到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機器設備，而且當時我國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也很難解決。可是，龍雲卻閉着眼睛說黑話，把蘇聯描寫成一副“放債圖利”的樣子，把美國說得那末“仁慈”。美國的“仁慈”是什麼呢？那就是一本萬利，敲骨吸髓，它借錢給你，就要控制你們國家的政治、軍事和財政經濟，把國家主權賣給它。遠的不說，蔣介石賣國集團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嗎？現在世界上不是有些民族國家都拒絕美國這種附有政治條件的借款嗎？龍雲不但仇視蘇聯，並且公然替美帝國主義宣傳起來，這不是露骨地反蘇、反共、反人民嗎？

此外，龍雲還攻擊我國的對外援助，說對外援助的預算太大，這也完全是胡說。事實上，我國對外援助的預算在我們國家整個預算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我們曾經用它來幫助朝鮮和越南人民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支援埃及人民反抗美法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等。這些都是為了支援亞非國家保衛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由於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撥出很多錢來幫助這些國家，所以只能量力而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得到我國的援助以後，都更增強了對我國人民的友誼，增強了保衛世界和平的決心。而現在龍雲連這些都反對起來了，這不是反對世界和平、反對亞非人民的團結是什麼？

由此可見，龍雲的這幾支毒箭，完全是對黨的外交政策的惡毒的攻擊，是和帝國主義分子一鼻孔出氣的。他想利用這些來攻擊黨，以便達到他的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到处点火，挑撥民族团結

龙云不但仇視苏联，攻击党的外交政策，并且到处点火，挑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团結。

大家知道，我們国家是各族人民友爱团結的大家庭，党曾經一再告誡我們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并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經濟和文化。可是龙云却在說瞎話，加以挑撥煽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云南省代表小組會議上，他竟說：“外来势力进入云南实行政治迫害”，又說：“今天少数民族已經自治，法律上已經平等，至于經濟文化，少数民族应自力更生，共产党没有什么办法。”龙云不但把云南解放和党几年来在云南的工作，說成是“外来势力进入云南”，是“实行政治迫害”；并且要少数民族“自力更生”，換句話說，就是要少数民族脱离共产党的领导，退出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另一方面，龙云又說：“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沒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这种說法，也显然是否定今天少数民族的独立存在和他們应享的自治权利，企图以此来挑撥和破坏我們的民族团結。

为了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挑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龙云还約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原州長、临滄專区佤族的副專員，四川涼山的彝族代表到他家里玩。表面上，龙云装着要他們帮助党整风，骨子里却是向他們点火，并且說：“各地合作社受灾减产，好些人要退社。”企图鼓动他們不要搞农业合作化，使少数民族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永远处于經濟落后的地位。

我們知道，龙云本身是屬彝族的，可是在解放前他統治云南的时候，他不但是騎在汉族人民头上，而且也是騎在少数民族头上的封建統治者，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剝削和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現在他却裝出一付“关心”少数民族的样子，竭力挑撥我們的民族关系，这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反对社会主义是什么？

揭开龙云的画皮

可是，龙云在向党进攻的时候，却裝着是一个“爱国者”，他經常吹嘘自己对“抗战有功”，是一向反对蒋介石追随共产党的。但事实又是怎样呢？

我們知道，“九一八”以后，龙云曾借口援助东北义勇軍，强迫云南全省人民出“救国捐”，結果他在这上面发了一大笔“国难财”。抗战期間，龙云不仅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和蒋介石一样，認為誰坚决抗日，誰就是“异党分子”，图謀不軌。在当时云南軍隊中，凡是积极抗日的，就被他怀疑，監視甚至被撤換、“整肃”；相反地，那些对抗战不力或临陣脫逃的分子則受到寬容。例如，他的大儿子龙繩武駐防騰冲，平日作威作福，大刮地皮；当日寇进入緬北时，他望风而逃，失地千里，掘載金銀財宝及大批雅片烟回昆明享乐。他的姪儿龙奎璧，駐防怒江惠通桥，也不战而退，縱火焚燒，大肆搶劫。至于龙云本人，則和汪精卫勾勾搭搭，当汪精卫去当汉奸路过昆明时，龙云还热情地接待他，把他送上了飞机。同时，他还把汪逆精卫的亲信梁雨皋留在家里，为他們暗中牽綫。在抗战期間，龙云一方面抓兵派款，囤积居奇，一方面大做雅片烟生意，他把从云南人民身上搜刮到的大批金錢，派人

送到美国，到现在他在美国银行里还有很多存款。

龙云还常常把“反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执行蒋介石的乱命。龙云一上台做伪云南省主席，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只有当蒋介石一步步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云南，企图并吞他时，他才迫不得已反起蒋来。

揭开画皮一看，龙云就是这样一貫反共反人民的封建统治者、土皇帝，但是他却打着帮党整风的幌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这不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吗？现在在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的怒火下，这个土皇帝已经完全现出了他的丑恶的原形。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棍葛佩琦

一个最凶恶的右派分子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里出现了一个最凶恶的右派分子。这个右派分子就是葛佩琦，他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由于他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的仇恨，他穷凶极恶毫不遮掩地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发出了恶毒的攻击，一下子就暴露了他的杀气腾腾的面貌，使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个原形毕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棍。

葛佩琦在人民大学向党猖狂进攻的发言，前后共有两次：一次是5月24日，一次是6月5日。在第一次发言中，他程度“今

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統購統銷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人民生活沒有改善”，并且惡毒地說“共产党员是監視群众的便衣警察”，“杀共产党人，不能說不爱国。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第二次，他又繼續发表极端反动的言論，說“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党员六亲不認”；又說“三害不鏟除，狂瀾既倒”，如不挽狂瀾，就“被狂瀾冲走，葬身魚腹。”

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惡棍，挑选了一些最惡毒的字样，象“潑妇罵街”似的，露骨地咒罵党，咒罵社会主义。他夢想这样就可以挑起人們对党的不滿，造成“天下大变”，达到他“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目的。但是，广大群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葛佩琦的反动迷夢一下子就被彻底粉碎了。

陷入了广大群众正义的包围

当葛佩琦的反动言論在报上公布以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仅仅一个上午，人民日报社收到駁斥葛佩琦的来信，就有八百多封。工人、农民更是不断地到人民大学来，要找他当面評理。如北京广播器材厂的几个青年工人，一看到报上登出他的謬論，当天晚上就给人民大学去了几次電話，問葛佩琦住在哪里，要找他講理去。因为是周末，沒有联系成，到星期一上班的时候，这事被車間里其他工人知道了，三三兩兩找来说：“跟葛佩琦評理，咱們一块去。”于是由几个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几十个人。他們冒着大雨，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去請記者来参加座談会。座談会沒有貼通告，也沒有通知誰，一下子就去了一百六十多人。

由于工人和农民們不断找上門来講理，葛佩琦那几天真是

“应接不暇”，但他还强作镇静，做出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就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抢着发言，愤怒地对葛佩琦的反动言论逐条加以驳斥。他们说：“工人、农民的生活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好了”；“肃反运动不是搞得糟，而是搞得好。”并且指出：“我们和党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和你葛佩琦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相隔十万八千里”。“母亲的奶一胀，就知道家里孩子在哭，还有谁能比得上共产党这样知道我们，关心我们。”“共产党不能领导，谁来领导？让葛佩琦你们来领导，那我们工人就毁了。”“共产党亡了，人民政权就会跟着亡。你们要推翻共产党，我们不答应；我们不答应，你们就推翻不了！”工人、农民在说理斗争中，摆出了大量的铁的事实，驳得葛佩琦哑口无言。

在这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也举行了几次声讨葛佩琦的大会，除全校师生员工外，还有来自工厂、农村的工人、农民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在声讨大会上，大家愤怒地斥责他，并要他彻底交代。但是，葛佩琦仍然躲躲闪闪，不肯向人民低头。他坚持说：他的反动言论是“向党进忠言”，“出于好心”。说他的发言，一部分是被别人“领会错了”；一部分是说得“不够含蓄”，“形容词用得恰当”；一部分是“感情冲动，脱口而出”。大家对他的这种虚伪“检查”非常不满意，愤怒地要求他好好交代，不能轻易让他滑过去。有些工人并向学校党委提出要求，希望学校当局“限定他时间深刻检查，要不然，就要求把他送到工厂去，和我们一起吃、住、干活，让我们来教育教育他；省得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胡说八道”。

在反右派斗争的怒火下，葛佩琦到处碰壁。当他到洗衣店去

送洗衣服，洗衣店的人見他写的名字是葛佩琦，就不肯給他洗；甚至連他家的媳婦，知道他这样刻骨地仇恨党和社会主义，也不愿意在他家里干活了。葛佩琦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惡棍，完全陷入了广大群众正义的重圍。

揭開葛佩琦的画皮

人們也許会問：葛佩琦为什么这样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呢？原来，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极端反共反人民的人物。

1937年葛佩琦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他流亡到了河南洛阳一带，曾一度混进共产党内，因为他不愿改变反动立场，不久被清洗出党，他投奔到国民党反动头子、大战犯胡宗南的手下。他在共产党内混过，知道党里的一些事情，又积极反共反人民，因此很快得到了胡宗南的欢心，被提拔做了国民党第一战区長官部的少將參議。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在东北担任国民党东北新聞通訊处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二組少將組長，正式干起特务来。

在沈阳的时候，他曾組織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进行反共活动，他以“山东同乡会主席”的名义，发通电給蔣介石，請求蔣介石討伐山东“共匪”，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入山东，还给伪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清奸匪”。另外，他还发通电給毛主席，内容是要求“停止赤化山东”。他就是这样一个彻底反共反人民的家伙。

解放前夕，他由东北跑到北京，以后混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到了这次整风的时候，他就揭开了他的假面具，象一条惡兽一样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了。原来这个别有来历的反动分子的迷夢

还没有醒哩！那末，在广大群众正义的围攻下，他就只有碰得头破血流了。

害群之馬 林希翎

当右派分子瘋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北京高等学校里出现了一个害群之馬、右派分子林希翎。她到处演講、作报告，煽动群众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臭名远揚的右派分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是一个极卑鄙极骯髒的慣騙。

女騙子手

林希翎是个女大学生，她在平时，特別是在她瘋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总要吹一吹她的出身历史，說自己“家庭是貧农成分，从小吃苦，受罪，十三岁参加革命，今年才二十一岁；有工人阶级觉悟，在部队里养成了战士作风。”听了她这段鬼話，不明底細的人，也許真会把她当做是一个純洁的青年，可是剝开皮来一看，却是一个捏白扯謊的專家。

先說她的名字，她的真名字叫程海果，浙江温嶺县人。再說她的年齡，那可誰也弄不清楚。去年她說自己是二十二岁，今年她又說是二十一岁；她說她十三岁参加革命，可是她母亲給她的信上却清楚地写着：“自从你十六岁参加革命，……。”可見在年齡上她至少就瞞了三岁。

她是貧农出身嗎？不对。原来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小

官僚，当过浙江省温岭县的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她父亲丢下她带着小老婆逃走了。她跟着她的母亲，家庭经济有了困难，后来她们搬到乡下去住。不久，林希翎参了军，政府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困难，分了几亩田给她们。这就是林希翎所吹牛的“贫农成分”的来由。

林希翎是个战士吗？不对。她只是不遵守革命部队组织纪律的捣蛋鬼！她从1949年10月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里三年另十个月，前后住医院休养九次，其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闹升级，不好好做事，就辗转调动了十三次工作，在一个工作单位最长的时间也不超过三个月。组织上把她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里养病，可是，她不但不好好休养，反而乱搞恋爱，经常偷跑，并且诬蔑医院是“监狱”。这就是林希翎所说的“战士作风”。

林希翎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她却乱吹牛皮，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招摇撞骗，装成一付“纯洁”的样子，便于向党进攻，好使人受骗上当。拆穿一看，这不是一个恶毒的骗子手是什么！

灵魂上生着毒瘤

1953年8月，林希翎离开部队，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起大学生来了。她梦想读了书，就可以当专家，飞黄腾达，高人一等。

在学校里，她自封为“有稜角的青年”。什么“稜角”呢？就是党团组织、学校行政任何人都不能碰她一碰。她把图书馆书籍上的插图任意剪下来贴在自己寝室的墙上；她可以随便退出伙食团又随便到食堂里吃饭；她可以随便骂同学是混蛋；谁干涉她，她就骂人家妨碍了她的“个性自由”。她曾经申请入团，但当

团組織帮助她克服缺点时，她却說：“你們要磨掉我的稜角，我宁可不入你們的团”；并且誣蔑帮助和教育她的党团組織是“压制”和“陷害”她的“魔掌”，罵党团员是“宪兵和警察”，把大多数靠牆党的同学說成是“拍馬，看领导的眼色行事。”

她时时刻刻夢想出头露面，抬高自己。1954年，她东拼西凑地写了一篇文章寄給文艺报，寄去以后就今天一个电话，明天一个电话，催促文艺报发表，說：如果不用她的稿子就是“压制新生力量”。当她知道文艺报要发表她的文章以后，她就到处向同学借錢买烟，喝酒，揚言馬上就可以拿到一大笔稿费，四处通知亲友看她的文章，并自封为“青年作家”。有一次，文学界討論一个问题，林希翎觉得这又是“成名”的新机会来了，她揚言要写一篇四万字的論文来反駁提出这个问题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她向学校里騙了一間房子和四十天創作假期。

但是，正当她的夢越做越美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揭露了她的欺騙手段，指出她的灵魂上長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瘡。这一下触怒她了，她說这是团中央报纸对她的“誣蔑”，于是到处喊冤叫屈。中国青年报当时觉得对她的批評也許重了一点，曾兩次公开檢討。中国人民大学的吳玉章校長和青年团中央書記胡耀邦同志也多次帮助和安慰她。照理說，她應該从这里深深体会到党对青年的爱护，并認真改造自己。可是林希翎呢，却变本加厉，发展到仇恨起整个党和整个革命組織来了。她写了一封近兩万字的控訴書，擅自向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散发，企图在全国学生当中掀起一个向党进攻的风暴。后来，經過中国人民大学、法院、中国青年报組成的調查組調查，証实她所捏造的事实完全是假的，才彻底揭破了她的阴谋。可是，她不但不接受組織的帮助和同学

們的劝告，反而更加仇視起我們國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她甚至猖狂地說：“你們共产党虽然有五百万軍隊，到時候也一样会垮台。”

瘋狂的进攻

林希翎就此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年五月間，党的整風运动开始以后，她和全国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开始瘋狂地向党进攻了。

那时，北京大学正在搞“大放”“大鳴”，譚天榮等几个右派学生正在張牙舞爪瘋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林希翎到了北京大学，馬上跑上講台加以支持。她張开血盆大口，露出一付凶相，大肆煽动，辱罵共产党，辱罵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主張要用暴力去推翻它；还替被鎮压了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并且污蔑苏联，污蔑共产党的領袖。后来，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接連发动了几次进攻，企图进一步点火煽动。

林希翎原是一个捏白扯謊和造謠的專家，她用了大量夸大的或莫須有的事实，向党放射了一支支毒箭。这些毒箭总起来說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誣蔑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主張来一个“彻底的革命”，推翻社会主义。第二、攻击党的領導。她說共产党是“以党代政”，并把黨員分成三类：一类是“混蛋”，應該“清洗”；一类是中等的，虽然不坏，但思想硬化，應該动員他們退党；另外一类是已經或正在腐化墮落的老干部。第三是肅反問題，她說肅反“扩大化”了，并且誣蔑人民法院是“惡霸作风”。第四，她誣蔑中国沒有真正的民主，因此大喊大叫要求“真正的民主”“真正的

自由”。

林希翎除在講台上公开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外，还联络了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組織了一个反共的小集团，领导他們專門散布上面这些反动言論，成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小集团的中心人物。

但是，广大群众很快識破了林希翎的阴謀，給了林希翎以坚决的駁斥。于是林希翎又召集她的小集团的人秘密集会，商量“作战計劃”，准备出版反动刊物，用鉛印散发到全国，把火点到全国各个高等学校，甚至密謀帶着面包到新华門請愿、鬧事；并且和她的小集团的人約定了各种暗号密碼，夢想繼續頑抗。

和老牌右派分子勾結

林希翎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不但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并且是和校外老牌右派分子勾結在一起的。

1956年，林希翎在北京东四区人民檢察院实习时，碰到了正在那里視察的別有用心的右派女將譚惕吾。兩個人臭味相投，都在鉆空子寻找所謂翻案材料，一見如故，很快地勾搭在一起了。譚惕吾称林希翎为“女儿”，林希翎叫譚惕吾为“慈愛的媽媽”，亲热得很。后来，她就常常去看譚惕吾，譚惕吾也常常把林希翎接到家里来。

6月初，林希翎的反动言論遭到了同學們的严重駁斥，她招架不住，就借养病为名，索性住到譚惕吾的家里，向譚“請教”。在譚的家里，林希翎又結識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个著名的右派分子黃紹茲。黃又傳授了她“战术”，要她“沉着地应付一切”，并且把她邀到自己家里去看案卷。黃紹茲还替林希翎吹嘘，

說她“虽然長得不好看，但談吐風生，公然反对党的領導而不害怕，值得欽佩。”

林希翎从譚惕吾的家里回到學校，譚惕吾亲自用汽車送她，并且商量好了怎样对党反扑。她回校后，竟然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質問人民日报的反右派的社論是誰写的，为什么要“阻碍整风”，并且打电话向人民日报的总編輯邓拓同志抗議。6月下旬，她又和譚惕吾訂了攻守同盟，譚惕吾叫她写信給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否認她們之間的勾結，她也赶快照写了。

裝瘋賣傻耍尽花招

尽管右派分子林希翎非常狡猾、猖狂，但她是逃不过广大同学的正义的斗争的。在同学们严肃的批判下，林希翎的反动論点被駁倒了，她所捏造和歪曲的事实被揭穿了，原来支持她或者盲目跟着她走的人也清醒过来了。当时，每天找她講理的人絡繹不絕，几千人的大会集中火力，对她进行批駁，林希翎理屈詞穷，还想狡賴。一天，又要开大辯論会了，林希翎知道又要出丑，就裝瘋賣傻，蓬头散髮，躺在床上，并且假裝服毒，企图进行恐吓。这时，她的反动小集团的人物已紛紛起义，向人民請罪，林希翎更慌了，于是就拉着原来支持她的一个男同学，不惜用拥抱、接吻的色情手段企图进行拉攏，更充分地暴露了她的女流氓和騙子手的本色。

林希翎这棵毒草現出了原形！北京广大学生的反右派斗争已經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湖南民盟右派集團頭目杜邁之

章羅聯盟在湖南的據點

北京的章羅聯盟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總司令部，以杜邁之為首的湖南右派集團就是章羅聯盟在湖南搞反動活動的據點。

說起杜邁之他的來頭可不小。1943年當他在雲南念大學的時候，他就是右派分子羅隆基、潘光旦、費孝通的得意門生。羅隆基自稱是英國反動學者拉斯基的門徒，杜邁之正是從羅隆基那裏學到了拉斯基的反動理論的；資產階級衣鉢真傳，一點也沒有走樣。杜邁之一貫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都是以這種反動理論作基礎。那時候，羅隆基在昆明主編“民主周刊”，潘光旦也在昆明主編“自由論壇”，杜邁之先後做過這兩種雜誌的編輯，和羅、潘的關係很密切。解放以後，杜邁之一有機會去北京，就要到羅隆基那裏去匯報請示；羅隆基的反共小集團的骨幹周鯨文和潘光旦到湖南來的時候，杜邁之又和他們密談。因為他們都是羅隆基的人，所以特別親熱，談的當然也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鬼話。

杜邁之要在湖南貫徹章羅聯盟的指示，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就得組織一班人馬。1955年下半年以來，杜邁之擔任了民盟湖南省委秘書長，他就逐步地把這個右派集團組織成功了。這個右派集團中間有康德、魏猛克、陳新民、謝世澂、屈子健、劉文炳以及湖南各個方面的一些反對共產黨的高級知

識分子和在民盟湖南省委會、長沙市委機關內的右派分子。同時，杜邈之要搞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就得改變湖南民盟原來的政治方向。他於是取消了湖南民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盟員鬧思想問題，他主張不要去批評，而是支持他們發牢騷講怪話，他還無恥地說這是“代表正當利益”。他又指示盟員對共產黨要“爭、頂、碰”，不要任何事情都去找共產黨商量。他四出派人到各基層活動。這樣，他就逐漸把湖南民盟引到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路上去了。

杜邈之上有章——羅聯盟撐腰，自己又有了幾班人馬，又篡改了湖南民盟的政治方向，于是就利用民盟公開合法的組織和他自己的民盟湖南省委會秘書長的身份，造謠誣蔑，散布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搞了許多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掛了“帥”印，成了湖南右派集團的頭目。

散布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謬論

杜邈之在向黨進攻中，散布了許多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其中的第一枝毒箭，就是針對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我們知道，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都有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進行思想改造，就不能好好地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正是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改造思想，使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杜邈之抓住民盟這個組織，自稱是“代表知識分子利益”，可是卻不贊成思想改造，並且還挑撥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他在1956年就說過：“思想改造的提法，現在要重新考慮。”後來又說：“現在知識分子不是思想改造的問題，而是改變業務條件的問題。”他以

为“共产党之所以对非党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情绪，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認識上存在有严重教条主义認識方法的結果。”

他还丑化共产党，把共产党說得象法西斯一样，他污蔑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好象是共产党的化身，把自己摆在根本不会有錯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准講好，不准講坏，只准奉承歌頌，不准批評反对，否則就是反对領導、反对党”，他說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只是个别的”。他还說宗派主义产生于“共产党強調組織性”，他說这“对全国的民主生活是有妨碍的”。以上的話是杜迈之在公开場合講的；杜迈之背后罵共产党罵得更凶，他說：“不見得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

1955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杜迈之对这个偉大的运动也很仇視，并把它說成是宗派糾紛。他說：“肃反对待高級知识分子的某些作法，我看不仅不恰当，而且令人寒心”，又說，由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特权思想所造成的缺点、錯誤，把非党知识分子的荣誉、尊严都扫倒了，智慧、良心遭到損害，积极性受到压抑。”他認為肃反运动的錯誤是主要的，誰說“肃反成績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同时，他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說：“我認為目前我們政治制度中党政关系这一环节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加以調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說：“中国一定会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中国的政权將会有变化”。他在今年5月举行的省政协会議上主張“从各种国家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說“我們要有改革社会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后，杜迈之更千方百計地进行歪曲。他說：“民

盟基層組織不一定要接受共產黨基層組織的領導”，又說“互相監督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他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可見馬列主義有許多東西過時了”，“唯心主義一定要開放，資產階級社會學一定要恢復”。

杜邁之反對知識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看到宣傳知識分子入黨是“知識分子的光榮歸宿”的提法便堅決反對，他說：“知識分子都入了黨，盟員都入了黨，民盟只剩下一點點人，怎麼辦？”他承認，怕知識分子入了黨以後，減少了自己的反共政治資本。

杜邁之散布這些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的用心是很惡毒的，他想借此燒起一把火，煽動知識分子都跟着他來反黨、反社會主義。

積極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杜邁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還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就開始了。從那時起，他就根據章羅反動聯盟的指示，按照右派分子費孝通的社會調查的辦法進行了“調查研究”的活動。杜邁之的所謂“調查研究”，就是專門收集共產黨的缺點；有人說共產黨的成績他就不聽，聽到有人罵共產黨他就高興；把材料收集起來大量印發，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他收集了罵共產黨的材料共有二十多萬字。

被章羅聯盟操縱的民盟中央在1956年下半年派了一個工作組到湖南，傳達了章羅的指示，說是要大發展，要把盟員人數擴大幾倍，給章羅聯盟做政治本錢。杜邁之奉到這個指示，就到处拖人，說是“除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外，都可以吸收入盟”。這

样一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湖南民盟盟员就比原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半,有一些历史不清楚、反动思想很严重的人都混进民盟里面来了。

杜迈之一方面用民盟的名义拖人,另一方面又帮助别的民主党派拖人,譬如说,他就帮长沙民主促进会拖过人。而且长沙民主促进会的秘书长右派分子王果还是他特地派进去掌握大权的。杜迈之还到处串通,和湖南各个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右派分子都挂上钩,以扩大自己的反动势力。

自从今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以来,杜迈之就更加猖狂了。他打起“帮助党整风”的招牌,专门搞打倒共产党的活动。

杜迈之根据章罗联盟的指示,从四月中旬起,七十天内召开了民盟省委会、长沙市委、基层干部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达五十次。杜迈之在这些会议上高叫“大放鸣”,内容有下面几点:(1)向共产党提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2)牢骚也可以发,受了“冤枉”的可以出来“伸冤”;(3)民盟要争取参加领导;(4)共产党不讲我们开会提意见,我们就自己开会,各民主党派可以联合开会,而且可以邀那些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来参加,请共产党来坐“被告”席;(5)共产党从省委到基层都有顾虑,怕人家提意见(这是杜迈之造谣),我们要去推动共产党;(6)提意见要谈小的近的,也要谈大的远的,要谈方针政策一类的根本性问题;(7)提意见不要怕报复,民盟省委替大家撑腰等等;背地里还指示干部去“搞大民主”,说是要有“社会改革”的精神,“不要怕牺牲”。经过杜迈之点火以后,长沙各学校、各机关的毒烟邪火就熊熊地烧起来了,杜迈之自然更加忙个不停,他不分日夜赶到各高等学校去亲

自啓战，火上加油。他还抽出了半个月的时间到桃源、常德去放了一把火。衡阳、湘潭民盟的右派分子受到杜迈之的指使，学了杜迈之的榜样，也就一齐放火烧山。

杜迈之还召开了“科学体制”和“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两个座谈会。第一个座谈会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第二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总而言之，是企图夺取共产党在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方面的领导权。

杜迈之又和康德、魏猛克等联合起来大举向省文化局进攻，污蔑省文化局的工作搞得很糟，说根源就是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又污蔑新湖南报办得很糟，说根源就是共产党有教条主义。他们阴谋策划办“同人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一句话，就是企图推翻共产党在文化艺术方面、新闻事业方面的领导，由他们这些右派分子上台，使资本主义复辟。

杜迈之对于学生闹事是极为支持的。他不但在一些高等学校布置了爪牙，煽动乱“鸣”乱“放”，企图推翻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今年五月底，他又亲自到湖南农学院、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去鼓动盟员“跟学生结合起来”，说是“大学生要和老师结合在一起鸣放”，学生闹事“可以给领导上补一堂政治课”。借此煽动学生闹事；而对中小学校的毕业生进行思想工作，他却极力反对。中共湖南省委布置要抓紧做好对中小学校毕业生的思想工作，杜迈之却指示中小学校的盟员搞“鸣放”。杜迈之这样搞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小学校的学生也起来闹事，这样，一下子把天下搞乱了，他就好趁火打劫爬上台。

当右派分子们兴风作浪到了极其嚣张的程度，湖南各高等

學校已經被他們掀起“大民主”浪潮的時候，杜邁之興高采烈地說：“這下子共產黨就不得不重視我們了”，他滿以為“共產黨完蛋了”，天下可以唾手而得。但是這個右派頭目高興得太早，6月上旬，工人階級說話了，全國掀起了反右派鬥爭，給予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沉重的反擊。但是，杜邁之還是不死心，他在6月中旬還繼續叫囂“大放大鳴”。直到群眾起來揭發這個老牌右派分子，向他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的時候，他才不得不承認他的罪惡的進攻遭了可耻的失敗。

康德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簡記

湖南民盟右派集團杜康聯盟的另一個頭目是康德。康德是民盟長沙市委副主委，湖南省政治協商會議委員，長沙市文化局局長。解放前，康德曾長期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一貫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人民革命事業。解放後，他的賊性未改，秘密組織“文藝沙龍”，糾集右派分子，拉攏落後群眾，顛倒黑白，造謠中傷，誣蔑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1957年5月，當黨提出整風的時候，康德更認為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時機已經成熟，向黨發起了總攻。

誣蔑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取消黨的領導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的反革命暴亂事件被鎮壓下去，康德却借此到處宣揚反對社會主義的謬論。他說“社會主義制度

产生个人主义，斯大林就受到了批判”，誣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反列宁主义的风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同时，他还反对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到处叫嚣“肃反运动搞错了，好多人不知为什么被斗的”，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并指使欧阳敏訥等肃反对象进行翻案，煽动他们向党委要求公开原始档案材料。康德对党报也怀着刻骨的仇恨，他誣蔑党报是“一大家族”，咒骂“讚党报如对严师”，咒骂新湖南报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教条主义”，公开提出“党报民办”，实际上就是要由他们这些右派分子接手；并且积极策划办“同人报”，以便和党报唱对台戏，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坛。康德反对马克思主义，声言“戏改工作不是马列主义可以领导起来的”。他在艺术问题上，一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说毛主席的说法不对，应该是“艺术标准第一，至少要艺术与政治平行”，企图攻击马列主义对文艺评价的标准。

康德恶毒地全面否定成绩向党进攻，公开誣蔑共产党“不懂业务”。他说省市文化局党组织不懂艺人特点，不关心艺人生活，都是些“假里手，外行，不懂装懂”，“把湖南的戏曲工作搞糟了”，“湖南表演艺术要绝传了”。并到处造谣说：“老艺人都会被逼得吊颈，跳楼”，“湖南饿死了艺人，党和政府不闻不问”。又说“这些人（指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同时宣扬“湖南文人被轻”了，企图以此挑起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以便跟着他们一道反对党。在鸣放期间，康德的反动集团还拟订了一个省市文化局长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德是省文化局长，陈浴新是副局长，严怪愚为市文化局长，黄曾甫为副局长。以上这三个人都是康德右派集团的骨干，可见康德阴谋篡夺党的

領導權是蓄意已久了。

造謠蒙騙大肆發展盟員，妄想以盟代黨

自從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後，民盟右派集團就別有用心地大肆發展組織，妄想以盟代黨。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提出了發展一百萬，二百萬，五百萬，八百萬盟員的計劃。去年年底，民盟中央右派集團又派了一個工作組來到湖南，以視察盟務為名，貫徹章伯鈞的大發展計劃，說“湖南民盟趕不上形勢”，發展組織存在着“關門主義”傾向。康德得了這個指示後，真是心花怒放，大肆叫囂“人多好稱王”，多次集會策劃於密室，派出爪牙錢文淵、丁國泉等奔走於基層，不擇手段地到處拉人入盟；并歪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說“互相監督是民盟對共產黨的監督”，宣揚“民盟和共產黨是兄弟黨”，毛主席提出了“兩個萬歲”，“民主黨派有搞頭了”。在散布了這些荒謬言論後，康德就在知識分子中公開發傳：“民盟是最有知識，最有本事的人的政黨，如果沒有本事，沒有知識，就是共產黨員也不要”，企圖以此譁眾取寵，拉攏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例如在藝人中間，康德就說：“民盟是藝術界的政黨，入了盟可以通行全國”，用這個來欺騙藝人入盟。在發展盟員的時候，康德特別強調拉攏落後分子，他說：“落後的也有代表性。”為了大發展盟員，擴充他的政治資本，康德還不惜在群眾中造謠誣蔑，例如他對一個有歷史問題的人說：“共產黨說你有歷史問題，不能吸收你入黨，你參加我們民盟吧。”對要求進步的人，康德就裝着懂得內情的樣子說：“你入盟是已經取得黨委同意的了。”企圖以此騙取群眾的信任。不僅如此，康德還利用請客、送禮等方式拉人入盟，并到

处散布所謂“先入盟，后入党”的“兩步走”的論調。他計劃仅在省市文艺界就要发展几百名盟員，再利用这些盟員来控制省市各文化部門和艺术团体，在康德的阴險策动之下，1956年年底还只有十几个盟員的民盟文化艺术小組，到1957年4月就发展到了34名，分別成立了文艺、戏剧两个支部。

康德这种違反盟章，不擇手段地大肆发展盟員，用心是极为惡毒的。他企图在全省文化單位首先建立起他的反动据点，扩大右派实力，然后篡夺党的領導，以盟代党，实现他的“人多好称王”的政治野心。

組織“文艺沙龙”，积极筹划广开黑店，向党进攻

康德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蓄謀已久的，早在1952年他就糾合一批右派分子組織了一个反党黑店，叫做“文艺沙龙”（“沙龙”是会客厅的意思）。这个集团以康德为首，它的骨干分子有陈洛新、蔣寿世、董每戡、魏猛克、严怪愚、黃曾甫、欧阳敏訥、田洪、翟翊等。他們經常在康德、蔣寿世的家里聚会密談，并且利用銀苑茶厅、德國酒家作为碰头的地方，还組織有“星期会”和“轉轉会”等，来团結一部分外圍分子，进行拉攏人联络人的阴謀活动。通过“文艺沙龙”的集会，他們計劃了一套反党綱領。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康德就首先在盟組織內发动了对党的总攻势，提出了“只談缺点，不談成績”的口号，并派出大將翟翊和得力走狗丁国泉等到处点火，搜集材料。翟翊遵照康德指示，从省文化局干部金式手中，騙得了一份长达八千多字的捏造事实、顛倒黑白的材料，以此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在省政协会开会期間，他們更猖狂起来，訂出了一套向党进攻的策略，分工負責，由康德从

戏曲工作方面向党进攻，陈浴新从文物管理方面向党进攻，翟翊从扶植民间艺人方面向党进攻，田洪从艺人生活方面向党进攻。他们定出的五项策略是：①攻击目标集中省文化局。②对事不对人，有了事实自然会有人负责。③从各自的岗位工作提意见。④多方策动鸣放（即拉攏出席和列席省政协会议的人，向党进攻）。⑤魏猛克发言是重点。并且由蒋寿世事先拟好了田洪的发言稿。果然，一到政协会议开幕，这些牛鬼蛇神就一齐出动了。在这同时，他们还抛出办“同人剧团”、“同人报”等一套组织方案，由田洪任“同人剧团”团长；蒋寿世任湖南剧院经理；魏猛克任“同人报”社长；康德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连“同人报”的编辑、记者等人事都有了安排，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只少一个驻北京的记者了。此外，他们还准备开设“演员之家”的黑店，作为拉攏艺人的据点。他们并明确制定了向党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是：

“先扫清外圍，后捣其核心”，就是首先搞掉党外人士，如省文化局的副局长刘斐章、艺术科长閻金鏢等同志，再直捣核心，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康德扬言：省文艺界的领导同志“都是一丘之貉，必须连根拔掉”。甚至连接管计划都做好了，由康德抓戏剧；魏猛克抓文艺；陈浴新抓文物、图书等。康德右派集团向党进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罗联盟——杜康联盟——康记“文艺沙龙”，就象由一条黑线直接联在一起。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路线的进攻。

康德正傳——三十年来的反共罪魁

康德是个三十年来的反共罪魁，远在大革命时期，他曾伪装进步，一度混入衡山县农民协会担任秘书，但到1927年大革命失

敗后，他立即叛變革命，逃往武漢參加了國民黨，從此赤胆忠心為國民黨效勞了。1928年，他在國民黨長沙縣黨部工作，曾發行過反共刊物，從事反共宣傳，無耻散布“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中國沒有階級，只有大貧小貧之分”等反共論調。馬日事變后，國民黨瘋狂地進行“鏟共”，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康德和反共頭子柳厚民、袁同疇勾結，擔任了湖南“感化院”（即集中營）的感化教官。1930年，康德又擔任了“長沙市民”鏟共宣傳委員會的編撰干事，為“鏟共”旬刊大寫反共文章，誣蔑“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赤匪”，辱罵共產黨和我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張獻忠，說“共產黨比闖獻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所寫的反共社論的最后，還提出了“我們要擁護何總指揮（即反共頭子何鍵）去鏟共”，“我們要擁護軍隊、團防去鏟共”等14條反共口號。1936年，康德依靠復興社特務頭子雷錫齡的勢力，在長沙辦了“力報”，同年10月，雷錫齡介紹康德加入了復興社。1938年薛岳上台后，十分賞識康德的反共“才干”，特地從邵陽把他接了回來，請他吃飯，並且要他當了偽省府的專員。1947年，康德又依靠軍統勢力，通過軍統特務頭子唐縱，得到南京國民黨中宣部的直接批准，復刊了“晚晚報”，直接由軍統局湖南站站長黃康永控制。康德擔任了晚晚報的副社長和總編輯，對共產黨更是極盡其誣蔑辱罵的能事，誣蔑共產黨是“共匪”；在晚晚報上充滿着“匪共竄犯”，“匪共逃竄”，“全殲股匪”等反共反人民的字眼，並且將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咒罵為“魔術師”。1947年軍統特務頭子何鍵來湖南視察時，在招待何鍵的宴會上，康德是主要陪客之一，同時，在藍肇祺家里，何鍵還曾向康德等面授機宜。

1948年，當我解放大軍逼近長江，蔣家王朝命在旦夕的時

候，康德在晚晚報上做詩歌頌蔣介石賣國的“丰功偉績”，惋惜蔣介石的八字不好，仇恨中國人民似乎“不該”把蔣介石看成紂王。

以上這就是康德三十年來的反共反人民的丑史。

康德是一個老牌的反派分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共反人民的罪魁。解放前，他一貫從事反共活動，臨近解放他又偽裝“進步”，解放後，黨和人民寬恕了他的罪惡，並安排他當了政協委員、長沙市文化局局長，而康德卻始終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敵視新社會，恩將仇報，挖空心思陰謀篡奪黨的領導權，推翻人民的天下，夢想使腐朽的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重新復辟，真是太痴心妄想了。現在，這個老牌反派分子在廣大群眾反右派鬥爭的鐵拳下，已經原形畢露，除了徹底繳械投降，真正向人民請罪而外，已經沒有任何別的出路！

湖南文藝界的大右派分子魏猛克

魏猛克是省文聯主任，湖南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的教授，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省政協的委員，同時又是民主同盟湖南省委會的代理主委。這個披着教授、作家外衣的人，卻原來是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右派分子！

在湖南文藝界反右派大軍的揭露下，現在他已經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魏猛克是右派組織的头子

魏猛克不是單人獨馬地進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動的，他一向是同一伙右派分子一道密謀策劃，狼狽為奸。他同湖南民盟的杜迈之、康德是個三角聯盟。杜迈之又是民盟中央右派集團頭子章伯鈞、羅隆基的“干將”，是章、羅聯盟駐在湖南的核心據點。

魏猛克和杜迈之、康德是經常秘密商談，討論他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動計劃的。1956年12月省人代會開會時，杜迈之就叫魏猛克攻擊共產黨。康德攻擊黨的發言稿還給魏猛克看過。事後他們集團中的人還稱贊康德的發言是“打中了共產黨的七寸”。1957年3月，魏猛克去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時，曾兩次出席了民盟中央的一些的會議，當面接受了章伯鈞的指示，“啟發”了他回省里點起反黨火焰的“積極”性。回來後就和杜迈之、康德積極活動。他們在民盟省、市委擴大會，高等學校，中小學的民盟基層幹部會上，研究、布置、煽動了向黨的惡毒進攻。

他們的集團下，又有個“文藝沙龍”的組織，是由一伙解放前的報痞子、電影、戲曲界和反動秘密會社的地頭蛇組成的。這里面康德是“元帥”，蔣壽世是“軍師”，陳浴新是“先鋒”，廣州的大學教授、右派分子董每戡是他們的“理論家”，嚴怪愚、翟翊、黃曾甫等也是其中的骨幹。這些人大都是民盟中的右派盟員。魏猛克1950年從浙江省調到湖南來時，就由董每戡介紹和蔣壽世有了聯系。他們把康德、蔣壽世家裏作為“司令部”，經常以請客吃飯為名，商談攻擊黨的領導。又以“銀苑”和“德園”茶館作為聚會據

点,叫做“星期会”或“轉轉会”。互通情报,制造謠言,謾罵党的领导,夸大党的工作缺点,伺机进攻。1956年下半年他們抓住省湘剧团改編“琵琶記”傳統剧目中的缺点,要魏猛克在文联召开会議攻击党的领导。魏猛克用以进行反党活动的許多材料,都是由康德供給的;康德攻击党的领导的种种坏主意,也都是事先和魏猛克有过商量的。总之,他們的活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

魏、杜、康集团的反动計劃

魏猛克、杜迈之、康德反动阴谋的一致目标是夺取文化教育界党的领导权。今年春天,杜迈之就和魏猛克等商定,在高等学校的民盟支部和小组中,布置討論民盟与共产党的关系問題。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盟中央的事;高等学校的民盟支部和共产党組織只是合作共事、互相協商的关系”。这就完全違背了自己的“盟章”,想煽动民盟基层組織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又筹划成立“高教盟委”,專門处理高等学校的盟务問題,計劃由中南矿冶学院院长、右派分子陈新民負責,魏猛克等参加,企图拿这个組織来代替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会。他們又商定,在文艺界进攻的目标,也是夺取党的领导,計劃在时机到达时,由康德出任省文化局局长、严怪愚任市文化局局长、陈浴新、黄曾甫分别任省市文化局副局长。魏猛克仍任省文联主任……。确定打出“党的‘宗派主义’”作为集中进攻的靶子,說:“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得很‘糟’。”和党爭夺知識分子,說:“党不尊重知識分子”,并攻击“党不能领导文艺”等。連进攻的方式采取搞“群众运动”也研究好了,想鼓煽起手下噢囉們給党来个“难得下地”。他們的分工是:杜迈之抓高等学校,魏猛克、康德抓文化艺术界。

煽動亂鳴亂放唯恐天下不亂

今年5、6月間，黨號召整風了。魏猛克看到“時機已到”，積極地進行了反黨的活動。他到處煽動人“解除顧慮，大膽提意見，不要怕犯錯誤”。並說“提意見不怕片面”，甚至瘋狂到號召“要發揮片面的積極性”。他唯恐天下不亂，恨不得一把火燒掉共產黨，鼓動對黨“狂風暴雨”。在民盟的一次會議上，有人說幫助黨整風應該“和風細雨”，他馬上反駁說：“黨內整風才是和風細雨，黨外幫助整風應該是‘群眾運動’”。並煽動中、小學教員中的民盟基層幹部要“向黨力爭”。並說：“鳴就是叫出來，大喊大叫地攻擊黨都可以。”在文聯召開的“鳴放”會上，他更大聲疾呼地煽動說：“要鳴他個滿天星斗，要放他個火花萬丈。”在這樣放火、煽動之余，他更放肆到要煽動黨團員“起義”，在黨團內部製造分裂。在政協會上，魏猛克說：“前一向共產黨員專門反駁黨外人士、唱花臉，現在為什麼不發言了？”在文聯鳴放會上號召說：“黨員也要發言，不要擺出個挨整的架子。”企圖煽動黨、團員和他們一起向黨進攻。

魏猛克這樣瘋狂地煽動時，唯恐共產黨還擊，便又威吓共產黨說：“黨內百分之九十的黨員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思想不通”，說“湖南省從省委周小舟書記以下都思想不通”。又說：“湖南黨不支持鳴放，缺乏歡迎鳴放的情緒。”周小舟同志在文藝界座談會上講話時，批評了一下文藝工作者事業心不強。魏猛克便到處說：“周小舟的講話，在鳴放之初，不可能不引起顧慮”。魏猛克可似乎很聰明，他在这里盤算着一箭雙鷗：一支箭想射住共產黨，捆住黨的手腳，壓住黨的反批評，好讓他們放肆攻擊黨

而不准还手；一支箭企图射住群众，使群众误认为民盟右派分子才“坚决”地贯彻政策，能领导鸣放，而跟着他们走。从而达到这些卑鄙的野心家“以盟代党”的目的。

亲临前线，充当了进攻“猛将”

魏猛克在大肆煽动之后，看到“时机成熟”，便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充当了进攻的“猛将”，向党向社会主义抛出了许多炸弹。

第一颗炸弹，是全盘否定党的文艺工作成绩。他在政协发言中，把党八年来领导文艺工作的成绩一笔勾销，说：“文艺界不活跃”、“文艺创作不繁荣”。“一年来发掘传统剧目有成绩，是因为宝藏本来很丰富，而且还是被动的”。说：“湖南不尊重老作家和有经验的文艺活动家简直是有传统的”。说：“培养青年作者有‘宗派主义’，对某些作者是‘教条主义’的‘粗暴’态度，甚至对他们的为人也有‘成见’”。他把文艺工作、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培养青年作者都说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并把原因归罪于共产党，说“这是省委不重视的结果”。于是作出一条“今不如昔”的结论。他的目的很明显：是以否定成绩的手法，证明党不能领导文艺工作。

第二颗炸弹，是咒骂党员领导干部。他深知党员对国家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作用，便把炸弹迎面投向他们。他说：“省委宣传部唐麟部长，也不过爱好文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党员干部是‘年轻、飘浮、狂妄、粗暴’”。说：“文艺要懂文艺的来领导”。他的目的也很明显：是以骂党员干部对文艺“外行”，制造“舆论”，迫使党员“下台”，好让魏猛克等右派分子“上

台”。

第三顆炸彈，是公然排斥黨員，干涉黨的事務。魏猛克在拋出几顆炸彈之後，以為共產黨的“大勢已去”，便索性撕去了幫助黨整風的假面具，擺出了“勝利”者的姿態，儼然成了領導者，毫無顧忌地指揮起黨的事務來。有人提出調省委文藝處黨員幹部來文聯工作，他竟加以拒絕。文聯召開鳴放座談會時，秘書處確定小組組長名單為每組一個黨員、一個非黨員，他竟狂妄到一筆勾銷了所有黨員組長名字，換上了對黨不滿的人。在文聯內部的整風會上，更囂張地指手划腳質問黨支部：“你們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平時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把“新苗”文學月刊的編委會和黨員副主編也一脚踢開，不讓他們參與工作。魏猛克就是這樣拋出他的第三顆炸彈，排擠掉一切黨員幹部，企圖把文聯的領導權力，抓在他一個人手里。

第四顆炸彈，是公然篡改“新苗”月刊的政治方向，把它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魏猛克深知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的，抓到權力之後，馬上便篡改了“新苗”的政治方向。在七月號上他企圖大量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素，他親自選出向愷然的“丹風朝陽”、劉祥的“前娘後母論”、葉柯的“風雨篇”和他自己畫的漫畫“創作傳達報告”。這些文章和漫畫，都是罵共產黨、罵黨員幹部、罵積極分子、罵黨的幹部政策、罵黨的負責同志、罵社會主義制度的。從這些文章中，人們只能看到“一片黑暗”。雖然有些文章，後來因反右派鬥爭已開始，發去排了字又被抽了下來，但魏猛克企圖把“新苗”變成右派分子的輿論工具，用它來大量散布反共反社會主義毒素的企圖，卻已暴露得一清二楚了。

原来是个老牌的右派分子

魏猛克为什么对共产党、社会主义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因为，他反共反人民并不是个新手，而是一个老牌右派分子。

魏猛克是地主家庭出身，亲自收过地租。远在1933年国民党在文化艺术上发动“围剿”革命文艺时，鲁迅先生是反“围剿”的主将。魏猛克就画过卑劣的漫画，从背后向鲁迅先生射了一支冷箭。1936年他在日本，正逢鲁迅先生逝世，革命文艺界沉痛地追悼鲁迅先生时，他又画了一幅漫画，讽刺谩骂鲁迅和追悼他的人。

魏猛克在廿年前，就和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有联系，是胡风的“好友”，胡风曾夸奖他“有鬼聪明”。他在长沙养病时，曾向胡风要钱，胡风也就寄钱给他。他在日本时，胡风还派了个托派匪徒去找他。1950年，胡风夫妇到杭州，魏还陪他们游西湖，让房子给他们住，来往非常亲密。

抗日战争中，有人介绍魏猛克去延安，并两次介绍他入党，他都拒绝。1940年，他却跑到昆明，找国民党特务陈××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又混进了民主同盟，搞起“民主运动”来。当闻一多、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他连盟籍也不要，逃到上海，成了民主运动中的逃兵。并向特务陈××表白自己的“忠心”。直到1945年，他还和陈××保持着“友谊”。

解放后，广大农民经过土改翻了身，他却不满意。农民找他退押时，他告诉人说：“考验立场的来了”。他对农业合作化、肃反等运动都表示怀疑。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他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上和阶级出身的根源的。

“头插野鷄毛”的右派“將軍”——陈浴新

一 幕 丑 剧

1957年6月初的一天，在長沙市一家菜館里一張杯盤狼藉的桌子旁，正演着一幕丑剧。有一个白鬚白髮白眉毛的老头，圓瞪着双眼，在破口大罵共产党：“他們說老子是酒樓茶館的民主，老子既不是大民主，也不是小民主，老子是中民主……老子在辛亥革命时就在搞社会主义。”“这些家伙，如果在过去，老子要来个白刀子进，紅刀子出了。”圍在旁边的一帮人却在眯眯地笑。……

人們不免要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大罵共产党，要来个白刀子进紅刀子出、自吹在辛亥革命时候就搞社会主义的“英雄”是誰呢？他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呢？圍在旁边的这一帮人对这幕丑剧为什么这样欣賞呢？

原来这是康德右派集团——“文艺沙龙”（“沙龙”是小客厅的意思，即以“文艺”为名的右派分子小聚会）的一伙人，正在集会庆祝他們在省政协会上向党进攻的“胜利”。上面所說的这个“英雄”，就是陈浴新，他是反动黑店文艺沙龙中的骨干。他正在乘“酒兴”，肆无忌惮地发洩他們对共产党的仇恨。

陈浴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对共产党怀着这样深刻的仇恨呢？这話說来就長了。

这样一位“英雄”

陈浴新的确是一位“英雄”，但可不是革命的英雄，而是反革命的“英雄”。有一次，他在会上公开向人誇口說：“你們知道我陈浴新是什么人？你是否知道我曾有头插野鷄毛的时候？你是否知道我曾有頂盔亮甲的时候！”这几句話就活画出了他自己的形象。

原来早在1927年，这位“英雄”曾一度投革命之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但不久便做了逃兵，叛变革命。叛变革命后，他馬上投靠反动軍閥何鍵，做了伪第四路軍教导总队教育長，帮助何鍵訓練爪牙。何鍵是湖南反共反人民的劊子手，陈浴新就是他的一名帮凶。后来抗战时何鍵失势，陈浴新又投奔軍閥刘建緒，做了伪二十五集团軍（第三战区副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并兼福建省延建警备司令。王东原在湖南当伪省主席时，陈浴新是伪省政府的高等顧問。湖南临解放前，陈浴新还当过伪湖南第十区的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在湘西一帶称“王”。同时，他是个惡霸地主，又是一个煤矿和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大股东，还当过反动帮会“乾坤正气山”的龙头大哥。的确，他头上插过野鷄毛，曾經“頂盔亮甲”，是个集地主、資本家、軍閥、官僚、帮会头子五位于一体的人物。

恩將仇报

解放前夕，陈浴新看到反动派大势已去，再度投革命之机，跟随程潜將軍起义。党和人民欢迎他这一行动，不但不再追究他过去的罪行，并且指派他担任了許多重要职务——省人民委

員會的委員、省人民代表、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此外，他还是民革湖南省委会的委員。但是，他絲毫不洗心革面，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却恩將仇報，繼續站在反动階級的立場上，一貫仇視共产党，仇視人民政权。他經常謾罵黨員是“党老爷”，团员是“特务”，向党反映情况的人是“狗腿子”。为了丑化黨員，他还写了一首诗：“头戴金盔一点紅，身披鎧甲綉龍，胯下騎的是群众，自高自大逞威风。”他得意忘形地把这首诗在政協小組会上当众宣讀，还做手势說：“吾乃共产党員也。”他仇恨共产党真是到了极点！

他对省文化局党組織經常进行誣蔑，說它是个“宗派小集團”，并且攻击省文化局的领导“不懂文化，都是文工团的，是戏班子，包而不办。”說“这些人都是要齣，这般东西都是滾蛋。”他是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自文管会划归省文化局领导后，四年多時間，他从不到文化局去，并謾罵文化局是“城隍庙，鬼都不上門。”“老子宁愿給里手提夜壺，不愿給空子提皮包。”省文化局要从文管会撥去一些圖書資料，他不但不答应，甚至誣蔑說这是“掠夺劳动成果”，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搞法”。这种抗拒领导，公然謾罵党組織的事，数也数不尽。他企图把文管会变成他的“封建王国”，由他来胡作乱为。

在文管会內，他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統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專門拉攏落后分子，打击积极分子。1955年，省委宣傳部朱凡部長（原兼省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离省后，他得意地說：“朱凡走了，文管会无人领导，我坐在这里，好象切肉一样，橫切也好，豎切也好。”当省文化局派了刘斐章副局長来做主任时，他公然抗拒，指着刘的鼻子大罵。文管会的同志对他的

搞法有意見，說他不民主，他就罵：“什麼民主，我就是個軍閥！”他甚至威吓某同志說：“要在解放前，早就把他槍斃了。”

他對翻身農民也懷着刻骨的仇恨。1957年春天，他到醴陵去視察，就耀武揚威地說：“解放前我是地主，下鄉踏過青，現在我們又當地主，又來踏青了。”1951年，惡霸地主鄭杰逃亡來長沙，他叫鄭到文管會當秘書。祁陽有一個惡霸被鎮壓了，他連說：“殺得可惜！”他對封建社會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非常嚮往，對人民政權却很仇視，說：“過去是國民黨專政，現在是共產黨員專政。”甚至向人宣傳：“我認為還是皇帝時代好。”

瘋狂進攻

陳浴新由於懷恨黨，懷恨人民政權，所以和康德、蔣壽世等右派分子一拍即合，早就參加了康德右派集團的反動的“文藝沙龍”，並成為這個黑店中的核心分子。“文藝沙龍”的首腦是康德，參加的人有蔣壽世、陳浴新、魏猛克、嚴怪愚、田洪、翟翊、黃曾甫等人，他們以銀星電影院經理蔣壽世家為基地，銀苑茶廳、德園酒家等處為聚合場所，每逢星期天或休假日，這伙右派分子就聚集在一起，發牢騷、通消息，策劃向党進攻。

1957年5月初，全國各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祖國天空布滿了黑雲，牛鬼蛇神紛紛出動。康德右派集團看准時機已到，於是也揭開面皮，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策略地向黨發動了惡毒的攻擊。他們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把攻擊的目標集中於黨所領導的省、市文藝部門。

首先，他們提出了“守住市文化局，進攻省文化局”的戰鬥綱領，要使“鳴放”形成“四面楚歌”，“一舉而打開省文化局

的大門”。他們的“戰略”是：“上下夾攻，內外夾攻，到處點火”。“上”，就是捏造事實，向中央、向省委告省文化局的“狀”；“下”，就是在藝人羣眾中挑撥、造謠、點火、煽風；“內”是拉攏幹部，刺激黨、團員“起義”；“外”是抓住藝人、文化工作者中對黨不滿的分子。一齊向省文化局進攻。

5月下旬，湖南省政協會議開會前幾天，他們又聚集在蔣尊世家裡進行研究。陳浴新便向康德獻策，提出了“進攻”的五項原則：（1）攻擊的目標是省文化局，要打得狠，打得准；（2）發言不要指出姓名，只要意見提出來，自然有人負責；（3）說話不離本行，從自己工作崗位上提意見，則領導的缺點自然暴露；（4）要抓住事實，尋找工作中的缺口；（5）要發動“羣眾”，要抓住藝人、文化人和出席省政協會議的人士，要造成鳴放氣氛。根據這個“進攻”原則，他們又作了具體分工，磨刀擦槍，積極配備火力，只待康德“主帥”發布“總進攻令”了。

他們企圖在“攻垮”省文化局後，就可以把共產黨員趕下台，換上他們這幫右派分子上台。為了順利作好“接管”工作，他們早就擬好了省、市文化局及所屬單位的“改組”名單：康德任省文化局局長，陳浴新任省文化局副局長，嚴怪愚任市文化局局長，黃曾甫任市文化局副局長，魏猛克任省文聯主任兼同人報社社長，蔣尊世任湖南劇院經理，田洪任國營湘劇團或同人劇團團長，翟翊任皮影木偶劇團團長或美術界領導。這些“大人先生”們好不高興，以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待省文化局黨組一倒，他們就好粉墨登場了。

烏云遮不住太陽

但是，烏云遮不住太陽，出乎這些右派分子的所料，就在他們向黨發射了一支支毒箭以後，工人、農民講話了，全國和湖南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了，這些牛鬼蛇神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一個個現出了原形。

反右派鬥爭開始後，陳浴新起初還想極力破壞。他反對批判儲安平、龍雲，說：“儲安平不見得反共”；說“龍雲是兄弟民族，我們要注意民族政策。”他也反對批判康德、仇碩夫，說：“康德的問題算不了什麼，是工作問題，是與省文化局的關係問題。”“仇碩夫這個人有點頭腦不清楚，開會整他，我看是胡鬧。”總之，他竭力想轉移反右派鬥爭的鋒芒，為自己和其他右派分子開脫，并把火仍然燒在共產黨身上，他甚至說：“右派中派左派，都是共產黨不要的。”在這同時，他还和康德在銀苑茶廳碰頭，訂立了攻守同盟，約定“言責自負”，企圖頑抗到底。

但是他的這些卑鄙的伎倆，同樣遭到了可耻的失敗，省文管會、文史館、民革湖南省市委員會連續召開了大小十多次會議，對陳浴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集中地進行了有力的揭發和駁斥。在鐵的事實的面前，陳浴新是無法抵賴的。

假裝替農民叫苦的老牌右派分子彭一湖

彭一湖是個怎樣的人

在反右派鬥爭中，湖北省揭露了一個老牌右派分子。這個右派分子假裝出一副慈悲面孔，專門替農民叫“苦”，惡毒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可是，把戲一拆穿，他原來是一個專門吞吸農民血汗的魔王。

這個人是誰？就是彭一湖，現在在漢口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當副主任。

說起彭一湖來，湖南很多人都是熟悉的。解放前，他投靠蔣介石，做過偽衡山實驗縣的縣長。由於他在做偽縣長的時候，竭力討好主子，反動政府曾封他為“模範縣長”。後來，他退職回家，靠了搜刮到手的民脂民膏，在他的家鄉——岳陽黃田山區，巧取豪奪了一百多亩良田，成為當地最有勢力的三大地主之一。這還不過幾年以前的事情，可是曾幾何時，他這個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現在却“可憐”起農民來了，這豈不是大笑話！

彭一湖當地主的時候，剝削、壓迫農民是出了名的。他一方面殘酷地榨取地租，四處發放高利貸，聚集錢財；一方面又大量地用賤價收購新谷，用高價糶賣出去，大發橫財。有個叫湯萬城的貧農，租了他家收谷十五、六担的土地，一年就要繳十担谷的地租，害得他負債累累，走頭無路。還有一個叫湯定南的貧農，向他家借了十塊銀元，利息是四個月一個對本。不到一年光景，湯

定南被逼得卖掉了柴山、水田，抵押了房屋，前后还了一百多元，还是没有把这笔账还清。最后逼得定南的妻子儿女，只好出外作工，弄得一家四散，流离失所。至于因借了他的谷子，压得伸不起腰的，那就更不知道好多了。有一年，新谷上市，谷价猛跌，彭一湖指使他的儿子，用二块银元一担谷的低价大量买进，而到了来年春天，农民又不得不用十二块银元一担的价格，忍痛向彭家买入。这样，彭一湖便发了一笔大财，而农民则更加贫困、破产了。

彭一湖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他自己是地方上的大士绅，他外甥是县参议员，他儿子是伪保长。那时候，彭家享有许多特权：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轮不到他家，抽壮丁也轮不到他家，因为一切负担，都给他们转嫁到农民身上去了。事实上，彭一湖是当地农民的统治主，他说什么，农民都得俯首顺从，否则，就要遭殃。因此，当地农民都很害怕他，除了交租、借钱、买卖谷子，和请他调解事情外，平时不敢轻易上彭家的门。有一年，七十多岁的寡妇夏姨跑到彭家讨饭，彭家讨厌她不该常来要饭，夏姨痛苦地说：“肚子饿，没办法，不来不行啊！”彭家认为她不该强嘴，抓住毒打，一直打得她在地上乱滚，连动也不能动了才罢手。最后，夏姨苏醒过来，只好哭着爬回家去。这些都是彭一湖干的好事！

破坏土地改革

1949年湖南解放了。彭一湖伪装进步，骗取人民和政府的信任，钻进了政府机关工作。虽然人民宽大了他，给他做人的机会，但他一直坚持反动阶级立场。他知道解放后要进行土地改革，

于是借口“秋征太重”，赶忙在1950年卖掉了四十二亩土地。当地农民形容说：“彭一湖象一只落汤鸡，慌慌张张地不管钱多钱少，出钱就卖，这样，他实得了一百六十担谷。”买了彭一湖土地的农民，每一回忆到这一点，都失悔自己上了一个大当。但彭一湖还不满足，1950年湖南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土改时，他以民主人士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休息时，他对贫农龔文秋说：“现在就进行土改太早了，你们一无耕畜，二无农具，三无种籽，土地分给你们岂不要荒蕪了吗？这会影响到生产。”他还主张：“现在减租就可以了，土改要推迟三年，等你们恢复了元气再说。”其实，这是彭一湖的毒计，因为他在乡下还有些田没有卖掉，他企图借此欺骗农民，好等他把田卖掉，逃避土改。

当土地改革正在紧张地进行，千千万万农民起来和地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彭一湖又大叫“斗不得，斗不得。”他认为：“农民斗地主不道德，损伤了人的尊严。”他举例说：“在香港，买只鸡倒着提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倒比英帝国主义都不如了。当时，彭一湖的真正主张是：“和平土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决！

不仅如此，彭一湖在土改中还公开包庇地主恶霸。他隐藏了一个杀过许多共产党员的凶手、国民党辖共义勇队的队长，并且还替他介绍了工作。另外，他还给他的大地主外甥，也介绍了工作。

攻击国家粮食政策

1954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广大的贫农和下中

农是积极拥护的。他們認為粮食統購統銷有三大好处：稳定了粮价，保證了供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是統購統銷最根本的主要的一面；当然由于当时統購統銷是項新的工作，沒有經驗，工作上难免不有一些缺点，加上1954年碰到全国性的灾荒，以致有的地方出現了粮食緊張的現象。于是彭一湖就钻空子，大肆攻击，并以民建中央委員的身份，写信給党中央，批評粮食統購統銷政策搞坏了，說：“农村留粮太少了，一个农民只留粮四百六十斤，連一半都不够。”并且捏造事实說：“人民吃不飽，体力不足，情緒低落，生产下降”，把粮食統購統銷說得一团漆黑，企图根本否定国家的粮食政策。

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篇鬼話！我們知道，彭一湖說的人民吃不飽的情况有沒有呢？有的，那是什么时代呢？那就是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即彭一湖当地主的时代。那时，許多农民沒有飯吃，只得吃野菜，吃苣藤，吃蕨根，碰上荒年只好四处流亡，出外討飯。彭一湖家乡的农民有句俗話：“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就是对当时生活的最好的形容。可是，解放后这个痛苦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自从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就在1954年发生水灾的那年，黃田乡却沒有一個人討飯，沒有一個人餓死。这些确鑿的事实，就响亮地打了彭一湖的嘴巴。

彭一湖說人民吃不飽、体力不足，影响了生产，更是一个漫天大謊。黃田乡1956年增产几万斤粮食，由于国家实行了增产不增購的政策，全乡平均口粮是五百二十斤，1957年許多农民都有节余，难道这不是确鑿的事实嗎？

彭一湖說留粮四百六十斤太少了，認為一个劳动农民起碼应留粮七百斤。这完全是一片胡話。就拿彭一湖的家乡來說吧，

全乡平均口粮是每人五百二十斤，已經够吃，許多农民还有节余。再拿实际产量來說，这个乡平均每人只有地一·六二亩，1954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只有六百一十五斤，要留七百斤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按照彭一湖的留粮标准，国家不但不能实行統購，而且應該拿粮食出来了。誰都知道，粮食是不能从天上掉来的，要靠农民种出来，卖给国家，国家才能保障全国人民包括缺粮农民在內的生活，保障国家的經濟建設。那末彭一湖說这种話，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誣蔑农业合作化

原来，彭一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場說話，他不甘心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他夢想地主阶级反攻复辟，好讓他重新騎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他到处造謠誣蔑說：“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生产降低了，农民处在飢餓的边緣。”企图借此挑撥党和农民的关系。

可是，事实怎样呢？农民給了彭一湖相反的回答。他們說：“合作化好得很”，“合作化救了命”。因为合作化消灭了剝削和压迫，能够較大規模地发展生产，能够做單干农民所不能做的事情，能够經受得了單干农民經受不住的困难……。拿1956年來說吧，这是合作化后的第一年，也是考驗合作化究竟有沒有好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們湖南省遭受了几十年来稀有的一次旱灾，而粮食的总产量却达到了二百零七亿多斤，比遭受严重水灾的1954年增加二十二亿多斤。农民的用粮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平均每个农民的用粮数量，約为570斤左右。同时，全省除灾情較严重的地区外，一般地区的农户，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收

入。就是老、弱、孤、寡、殘疾的社員，也在生產、生活上，得到了安排和照顧。合作化如果搞糟了，這些成績是哪里來的呢？

不僅如此，好些地區在合作化後，還積極發展了墾荒事業和水利事業，農民們有組織地墾荒、修堤、開塘、築壩，為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糧食產量和保證豐收，創造了條件。還有好些地區設立了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和抽水機站，這些不都有力地駁斥了彭一湖的謊話嗎？彭一湖在各種運動中，還拚命地打擊黨員和農村幹部。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反對共產黨，挑撥黨員、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好使共產黨孤立起來，達到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目的。

向党發動更瘋狂的進攻

1957年5月黨開始整風了。彭一湖心中暗喜，以為“機會來了，出頭的日子到了！”他到處点火，到處爭取人、聯絡人，滿以為這下子可以推翻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權。

他裝出一付“同情”農民的面孔，在6月間中共武漢市委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就以這個做題目，再一次拚命地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說什麼“當前人民內部嚴重的矛盾是農村矛盾，而農村矛盾主要又是國家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他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業合作化罵起，一直罵到黨員和幹部止。他還聳人聽聞地說：“農民在過着飢餓的生活，如果再不徹底改變，天下就要大亂了。”他夢想這樣就可以挑起農民跟着他一道來反對共產黨。可是彭一湖的陰謀完全失敗了，就在他發言後的幾天，岳陽黃田鄉的農民寫信來質問他說：“你可記得借你一塊光洋要還兩塊嗎？你可記得租你十來担谷的地，要納十担谷地租

嗎？你为什么不早发善心呢？你現在明明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哩！”

可不是嗎？早在土改后的第一年，彭一湖就唆使他的儿子將分給貧农的一部分财产夺了回去。去年彭一湖又以作紀念为名，托人將分給貧农万毕玉的一个磁盆換回去了。当地农民憤慨地說：“过去这里的土地是你彭一湖的，房屋也是你彭一湖的，是不是也要作紀念呢！”

事实証明：广大农民是热爱共产党的，他們知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們才能推翻象彭一湖这样大大小小压在他們的头上的封建势力，才能走上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彭一湖这个右派分子如果再不悔悟，再不放弃他的反动的立場，是一定只有走上最后的絕路的。

隐藏在中学教师队伍中的 右派毒蛇——楊繼华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在長沙市第三中学的教师队伍中，揭露出了一个自封为“人民的忠臣”，实际上是穷凶极恶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蛇，这就是三中的历史教师、右派分子楊繼华。

法西斯党徒

話得从十六年前說起。一九四一年，正是全世界善良人民向战争魔鬼——德、日、意法西斯进行生死决战的时候，正是中

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关头。然而，也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小撮无耻之徒，他们“认贼作父”，以敌为友；而对爱国的人民，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救星——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刻骨的仇恨。右派分子楊繼華便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无耻之徒，对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罪魁——法西斯匪徒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妄想和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一样，趁着国家灾难深重的机会，通过种种卑劣凶残的手段，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法西斯统治。那时，他还在伪“国立”十一中讀書。在学校中，他就发起組織“正血党”，明目張胆地提出了“消灭共产党，統一全中国”的反革命綱領。这个組織以三青团員为主要发展对象，后来曾經改名为“三S社”、“三民主义铁血救国团”、“第五分队”等。从这些充滿血腥味的招牌，也可看出他那凶神惡煞的本相来了：如“第五分队”便是明白地說出要以杀人不眨眼的国际反动間諜組織“第五縱队”为榜样，向共产党和进步人民进行恐怖活动。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无耻的家伙，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他以三青团骨干分子的身份，監視进步同学，搜查淪陷区逃出的难民，到处吹嘘蔣介石“人格偉大”。有些同学听了蔣介石的臭名不愿意立正，他也橫加干涉。1946年，他从反动“青年軍”中混了一年回来，被保送到湖南大学政治系讀書，又做了該校三青团分团服务股長，进一步施展了他的特务伎倆。他一方面伪装进步，打入进步学生运动的心臟，一方面和国民党特务密切联系，里应外合，进行破坏。1947年7月，蔣匪經国在浙江举办“青年軍夏令营”，集訓复員“青年軍”中破坏学生运动有功的

反动骨子。楊繼華當然也積極參加了，蔣經國還親自召見他，面授機宜。可見楊繼華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是如何得到他的主子的賞識了。

繼續與人民為敵

解放後，共產黨本着寬大精神，沒有把楊繼華作反革命分子懲辦，還給了他人民教師的重要職位。楊繼華如果稍有人性，就應該老老實實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向人民贖罪。然而，“狗改不了吃屎”，楊繼華仍然不肯放下屠刀，並堅持反動立場，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他的母親是地主，在土改時被農民鬥爭過，他一直懷恨在心，咬牙切齒地罵：“今天共產黨執政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暴力統治”。對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民主集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他却用專橫暴戾的秦始皇作比，他叫囂着：“秦始皇專橫統治，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今天的工人、農民也該拿扁担鋤頭推翻共產黨”。當然，他也知道，要唆使解放了的工农反對他們自己所熱愛的黨和政權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便把希望寄托在國內外敵人身上。他一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喊冤，說：“胡風不是反革命，而是反宗派主義的英雄”。他還動員另一教師寫文章替胡風翻案。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了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人民的政權曾一度為帝國主義者和匈牙利人民的叛徒所篡奪，楊繼華便拍手稱快說：“匈牙利人倒下去了，全世界人民站起來了！”滿以為社會主義陣營这下完蛋了。整風運動初期，他從報紙上看到右派分子葛佩琦瘋狂叫喊要殺共產黨人，立時眉飛色舞地說：“中國還確有不少英雄！”他自己也認為“時機已到”，一方面到處搜集材料，準備寫反動文章，一方

面串連該校另一右派分子刘琪等等划結社組党，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他的法西斯反动組織。

他还利用人民教师的职位，在課堂上散布毒素，歪曲现实，誣蔑新社会沒有民主自由，挑撥学生反对班干部和积极分子，企图在青年們的純洁的心灵中，燃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焰，作为他推翻共产党的罪惡資木。

一 枝 毒 箭

1957年5月，国内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一时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地上群魔乱舞，其中就有一个楊繼华，他和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紧紧呼应，向党射出了一支毒箭。他經過長时期的准备，写成了一篇反动透頂的文章，叫做“我的管見和忠言”。

在这篇文章里，他表面上裝着帮助党整风的样子，實質上，却是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最毒辣的攻击。他狡猾极了，先把自己裝扮成“人民的忠臣”，用“正义”、“良心”、“正直”等漂亮帽子罩住自己，企图迷惑人們，使人們中了他的毒箭还一时发觉不到。

楊繼华的这篇文章，是紧紧抓住宗派主义来进行污蔑的。大家知道，宗派主义原是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坏东西，是共产党所坚决反对的历史遺毒。共产党进行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就是为了彻底清除社会殘存的思想毒害，团结全国人民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可見共产党和宗派主义是絕對不相容的。

但是，楊繼华却裝着不懂得这个道理，閉着眼睛說瞎話。首先，他把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說得一无是处，把新社会說成一团漆黑。他辱罵共产党员是“唯唯諾諾、俯首貼耳的奴才”，辱

屬国家工作人員是“看領導眼色行事的小人”。他說，黨宣傳政策，象伊斯蘭教的教主一樣，一手拿着可蘭經，一手拿着劍，強迫群眾接受。他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各級幹部描寫成凶險的軍閥和惡霸，並且誣蔑黨的幹部政策是“家長式的宗派統治”；黨和民主黨派的关系是“一夫多妻制，民革排大房，民盟排二房……。”同時，他還歪曲民主集中制，說選舉是“派舉”。

楊繼華用盡了一切造謠、污蔑、歪曲的本事，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把“宗派主義”的罪名加在黨的身上。他說：“宗派主義在全國已經氾濫成災。”並且狂妄地喊叫：“共產黨有無誠意反掉宗派主義，是應該從制度上着手的。”換句話說，就是產生宗派主義的根子，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既然這些都不好，應該讓誰上台呢？楊繼華說：“應該是各個民主黨派來共理國事。”大家看看，楊繼華的凶惡的本相完全暴露了：原來這個反動成性的右派分子還在妄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呢！難怪他這時那樣熱心地要恢復他的反動組織——“正血黨”，原來他還妄想拿這個反革命的組織來和共產黨“平分天下”，並且篡奪共產黨的領導哩！他這種見不得天日的反革命勾當還經得起人民鐵拳的一擊嗎？

瘋狂的掙扎

這篇反動文章在報上登出以後，楊繼華得意忘形，以為這下子真會致共產黨的命了。於是，他在教師和學生中間大肆宣傳，並一連買了幾十份報紙，分送到各地，企圖在全國各地進一步點火。他的妻子、右派分子郭宏量 and 另一個同伙劉琪，也到處為他喝采。但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和正直的知識分子是不能容忍右

派分子公然这样猖獗的，在新湖南报上、长沙日报上一篇篇痛斥他的文章出现了。人们清楚地看出：楊繼华不是“人民的忠臣”，而是一棵必须铲除的反动成性的毒草！

但是，楊繼华这只疯狗，不但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反而惱羞成怒，更恶毒仇恨党的报纸。他和刘琪一起煽动和利用了这所学校里一些被他迷惑了的教师，联名写信向新湖南报抗议，并且鼓动学生闹事，企图打毁新湖南报的办公大楼。他还和他的老婆一唱一和，扬言要到北京的外国大使馆“避难”。他企图用这些来吓住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但是他的这个狂妄的梦想又失败了。在广大群众的愤怒火焰中，一场反击右派分子楊繼华的斗争在长沙市三中展开了。现在，这个右派分子已再也掩不住他蝎子尾巴上的毒螫了！